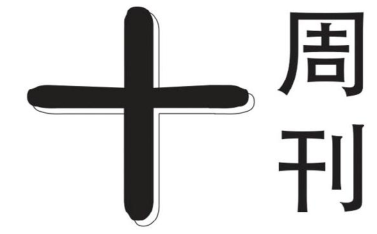
一五一十周刊

NO.113
2013年07月05日

弗拉迪斯拉夫·祖博克：日瓦戈的孩子| 金雁：誓言与暴力|
陆南泉、沈志华等：谁抛弃了前苏联？

"存在的"和"不存在的"苏联



UNIUNEA SOVIETICĂ

我在中國 論壇
Co-China

编者的话

最近，北京电影学院学生王一琳的毕业设计作品《前进，达瓦里希》引发了热议。争议的焦点，是这部作品通过多重隐喻传达出的对苏联时代的怀念之情。

从 1922 年 12 月 30 日建立，到 1991 年 12 月 25 日解体，苏联曾经满怀共产主义理想，经历了红色的激情年代。然而，不恰当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让这个“超级大国”存在了 69 年就走向了消亡。如今，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苏联？如何评价苏联时代的理想与激情？这样的理想与激情真的值得我们怀念吗？

本期一五一十周刊聚焦于“存在的”和“不存在的”苏联。“存在的”苏联，是指切实存在的、历史上的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不存在的”苏联，是指实体的政权解体之后，世人对苏联的想象、回忆和评价。

内战结束之后的苏联实行的是“真空罩”式统治，人不被当作自由的、有精神的生物，而被当作必须驯服与加工的生物。虽然有政策上的高压，但是对于“新俄国”的梦想，促使很多流亡在外的俄国知识分子回归祖国，只为投身革命，投身崭新的世界。作为代表之一，帕斯捷尔纳克经历了从满怀激情与理想到经受压迫看清专政的历程。作为旁观者，纪德代表了西方世界的一类人：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失望与不满促使他们对社会主义的苏联充满了想象和期待，但当真正走进之时，纪德们发现，那都是“不存在的”苏联，在真实的苏联，“人民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不幸，比任何国家都更加缺乏自由。”

苏联时代的激情与理想没能维持多久，它转而“异化”成了激进的、专制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金雁的文章写道，出版界曾被视为“革命的母亲”，工人曾被认为是真正的主人，但布尔什维克走上权力的舞台之后，出版自由与劳动自由被剥夺得一干二净。李永忠、董瑛、陆南泉和景凯旋的文章则分别从政治、经济、文化论述了苏联时代激情与理想的后果。政治上，苏联共产党在 93 年的建党、74 年的执政历程中，纯洁性一步步丧失，最终崩溃。经济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导致了经济的僵化与农民的“揭竿而起”。文化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以“宣传”为一切目的的政策让艺术失去了生命力。

周刊的最后一部分，陆南泉、沈志华的对谈回顾了苏联走向解体的过程，分析了解体的原因，提出“今天不能用现在中国的理论和做法，机械地评判前苏联模式的是非对错。”对

于俄罗斯人来说，他们如何看待苏联时代？南方周末特约撰稿姚望写道，俄罗斯人现在会不由自主想起 20 年前。俄罗斯反对派们在苏联解体纪念日前的示威本身，可能就是这个国家转型以来的最大后果。刘瑜则试图跳出对苏联-俄罗斯的“想象”，认为在思考苏联-俄罗斯问题时，应该摘下有色眼镜，既要吸取“教训”，还要汲取“经验”。从《前进，达瓦里希》本身说起，余亮认为这部片子引发的争论显示，新生长起来的青年已经没有了前人念念不忘的历史负担，固然很多读书人仍纠缠于苏联道路与美国道路，而且这样的争论也确有必要，但大多数时候已经变成无趣的精神恐吓，令自己在自己制造的紧张感里乐此不彼。



目录














【述】

11-1 弗拉迪斯拉夫·祖博克: 日瓦戈的孩子


弗拉迪斯拉夫·祖博克

“

帕斯捷尔纳克和很多在前革命时期的大学接受过教育的年轻学者仍然信任革命。他们相信自己正在目睹“新世界的诞生”。帕斯捷尔纳克对于自己与家庭的分道扬镳感到痛苦，但他依然坚信，只有“新”俄国才能创造出崭新的文化。对于新俄国的梦想，促使很多流亡在外的俄国知识分子回归祖国，只为投身这崭新世界。

”

1955 年 12 月，俄国诗人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在位于佩里德尔基诺山区的书房里完成了一部小说，他欣喜若狂地给朋友写了一封信：“你无法想象我做到了什么！我给那些所有导致痛苦、迷惘、惊愕和争辩的事物命了名，而且是用最简单、直白且悲伤的词语。同时我还重新定义了那些最重要的事：天空与大地，激情与创新，生命与死亡。”悲剧的是，这些主题恰好对应了帕斯捷尔纳克自己，以及上千名生活在苏联革命时期的俄国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人生历程。

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于 1890 年出生在莫斯科一个被同化的犹太家庭。母亲罗莎莉亚·考夫曼是一位钢琴家，父亲列昂尼德·帕斯捷尔纳克是一位杰出的艺术家。帕斯捷尔纳克一家处于莫斯科的创新氛围中，而在年轻的鲍里斯成长过程里，他结识了众多教授、音乐家、艺术家，以及小说家和诗人，这些人中包括拉赫玛尼诺夫、斯克里亚宾。他的父亲与托尔斯泰交好，并为这位文学巨匠画了他最好的肖像之一。

帕斯捷尔纳克的父母见证了俄国知识分子的艺术追求。俄国知识分子在 19 世纪中期沙皇的统治下悄然现身，他们并没有形成一个具体和清晰的社会团体，也没有可以定义的性格特征作为考量。按照惯例，那些在 20 世纪早期被定义为“知识分子”的人一定是反对沙皇政权，并支持 1905 及 1907 年革命的。很多俄国知识分子都相信，当社会从独裁中解放出来，就会进入一个充满无限创造力的阶段。1900 年代早期，和大多数知识分子、艺术

家、大学生一样，帕斯捷尔纳克一家期待着俄国的社会与文化能从沙俄的独裁与腐败中抽身出来。父亲列昂尼德·帕斯捷尔纳克，否认了自己的犹太背景，接受了洗礼。然而，小鲍里斯却一直伴随自己的保姆阿库利娜——一位虔诚的教徒——前往东正教教堂礼拜。他经历了旧时莫斯科神秘的拜占庭氛围：上百座大大小小的教堂，黑斗篷，蓄须的牧师和僧侣，长长的东正教祷文，美丽的合唱团，以及教堂内点燃的让人昏昏然的香。这些东西在多年后拯救了他。

帕斯捷尔纳克在马堡学习德国哲学。1914 年，俄国参与奥匈帝国和德国之间的战争时期，他开始写诗。在最初的爱国热情之后，他对这个国家的情绪转向了对沙皇政权大屠杀的愤怒。1917 年 3 月，彼得格勒爆发革命，欢呼雀跃的人民将其称为“自由的黎明”。帕斯捷尔纳克一家和他们的朋友们都相信，俄国不仅会赢得战争，还会加入西方的民主世界。不久后他们的梦被碾碎了，眼前的世界满目疮痍：无政府混乱，暴力群殴，经济大萧条。1917 年 10 月，列宁和托洛茨基建立了临时政府。在帕斯捷尔纳克眼中，俄国革命代表了一种自然力量，是人民精神力量的觉醒，俄国将从此跨入崭新的阶段。当事情正逐渐发展为血腥的混乱时，他仍然坚持这么想。1921 年，他出版了一本情诗集，全书采用全新的语言和写作方式，精彩绝伦。由于同步于革命时代，这本诗集受到了当时俄国顶尖诗人的赞誉，其中包括安娜·阿赫玛托娃、玛琳娜·茨维塔耶娃、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以及马雅可夫斯基。

布尔什维克领导者们巩固俄国新秩序的同时，却也摧毁了帕斯捷尔纳克一家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个人的创作自由，来自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文化源泉，以及公民团结与知识分子表达异见的机会。布尔什维克领导者们逮捕、暗杀或流放了数以千计的贵族、神职人员、中产阶级以及受过高等教育的专家学者——正是出知识分子的那群人。知识分子被看作是一个社会阶级和危险的政治对抗力量。当时社会充满了恐怖氛围，每个阶层都在暴动，而俄国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蒙受了深重的灾难。彼得格勒损失尤为惨重。至 1923 年，俄国科学院近半数的成员死亡、移民或被政府驱逐出境。列宁政府在 1917 至 1921 年之间，担心知识分子会衍生“反布尔什维克情绪”，驱逐了一大批大学教授、哲学家、经济学家、作家、记者出境。剩下的则选择移民，到国外继续正常的生活和教育，其中就包括帕斯捷尔纳克的姐姐约瑟芬——她去了柏林。1921 年，帕斯捷尔纳克的父亲、母亲和妹妹都去了德国。1923 年，帕斯捷尔纳克和他们一起在柏林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然后回到了莫斯科。从此他再也没见过他们。

尽管社会上在宣传新经济政策的解放，但抓捕异见知识分子的行动仍然在继续。起初，脱离政治、活在自己的文化世界里似乎是可行的。同时，很多年轻的艺术家都对布尔什维克发起的文化项目感兴趣。这些项目看似推进无产阶级文化，并在旧俄国文化遗产和大众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政府支持的“复兴”计划得到了很多工人的支持，他们接触到



了文化，并渴望用新文化形式表达自己——当然是在革命文化的框架下。帕斯捷尔纳克和很多在前革命时期的大学接受过教育的年轻学者仍然信任革命。他们相信自己正在目睹“新世界的诞生”。在他们看来，移民，或说投入“旧世界”的安全怀抱就意味着文化之死。帕斯捷尔纳克对于自己与家庭的分道扬镳感到痛苦，但他依然坚信，只有“新”俄国才能创造出崭新的文化。对于新俄国的梦想，促使很多流亡在外的俄国知识分子回归祖国，只为投身这崭新世界。

不过，他们梦想的新世界并未到来，取而代之是苏联的崛起。1930 年代早期，斯大林巩固政权时，国家对文化自治和多元化的容忍彻底结束。斯大林政权采用极左的教育体系，要求重新塑造学术及科学阵营。它利用作家和记者制造神话，掩盖大恐怖、饥荒和奴隶经济。最终，斯大林得以完全掌控文化出版物。官方要求苏联人民在文化、科学上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提高，成为合格的“苏联知识分子”。政府允许这类人群优先获得稀有资源，比如食物。1934 年，国家成立“创作联盟”，吸纳作家、评论家、音乐家、艺术家、建筑师、电影人和戏剧创造者。同时，科学家和学者被纳入政府管辖的学院机构。文学——曾经作为知识分子的“人生的老师”——成为斯大林艺术的重要支柱。斯大林赞美文学家，称他们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苏联领导人让文学家自己建造他们的文化艺术监狱。1934 年苏联作家大会上，马克西姆·高尔基被任命负责管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新文化教义。但在实践过程中，这教义很快变成了斯大林个人喜好的投射。所有“苏联知识分子”都要服从斯大林对文化作品“永远正确的判断”。

当局开始删除俄国文化中“反动”的部分。与此同时，他们拣选古典俄国文学巨匠如普希金、托尔斯泰和契诃夫，以及革命先锋如马雅可夫斯基，入驻斯大林文学圣殿。在斯大林的恐怖高压下，整个国家庆祝了普希金的百年忌日。每一个小镇，每一个集体农场，甚至每一个小商铺都必须要用讲座、阅读和表演来纪念这位俄国诗人。对普希金的狂热崇拜为百万人民定义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象征。斯大林的新苏维埃宪法规定，所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属于苏联知识分子，这是一个处于社会蛋糕中间模糊的“夹层”，处于号称“翻身当家作主人”的工人阶级和集体化农民之间。

斯大林将俄国革命和社会文化转型的成果归功于苏联知识分子，借此获取他们的支持。很多旧知识分子受到社会大波动的刺激，决定随波逐流——即服务这个政权——有些会向秘密警察告密，还有些人甚至将斯大林视作历史的化身。1930 年代苏联的文化生活仿佛变成电梯的两端，向下走的那一端站着已然幻灭、愤世嫉俗、心碎并辞职的那群人，而向上的那一端则是那些依然年轻、充满抱负、乐观并充满理想的人。

1930 年代的大恐怖，让那些原本欣喜参与革命、为布尔什维克政权服务的人感觉自己身处陷阱。数千知识分子因害怕逮捕和审讯，开始销毁文档，焚烧日记。现在可以认定，



几乎每种与文化、教育、工程相关的职业中都拥有一份密密麻麻的告密单。那是一段知识分子相互攻击、牺牲同事只求自保的阶段。不论谁家里有亲戚是贵族、神职人员、商人或富农，都岌岌可危。1928 年，列宁大学的学生德米特里因为与哲学圈过从甚密、热爱俄国文化被捕。在索洛维茨基（Solovetsky）群岛上的特别劳改营——古拉格集中营度过两年时光后，他得以回到列宁格勒，成为科学出版社的校对员——而这里充满了各种因为家庭成分不好而找不到好工作的人。1934 年，他听一个女人说她正在制作一份“贵族名单”，而自己就在份这名单上。实际上，他并没有贵族背景。他提出可以自费帮忙把名单重打一份，救了自己一命。这份名单上的所有人后来都静静地消失了。

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也为斯大林对俄国的变革而着迷。他也感觉，集体主义正迫切地要与旧知识分子“腐朽”的个人主义分道扬镳。不过，他的智慧与信仰令他很快认清了斯大林主义的现实。他看到斯大林的集体化政策是如何摧毁了乡村，致使农民讨饭为生，无数的农民家庭被迫迁到西伯利亚。1933 年，希特勒在德国掌权后，帕斯捷尔纳克给在柏林的家人去信，将纳粹和斯大林主义放在一起比较：“相继出现的这两种社会模式有共性：让世界变得更糟。”

当斯大林造成的社会恐怖日趋扩大，帕斯捷尔纳克近乎绝望，身处自杀边缘。帕斯捷尔纳克被斯大林授予“苏联第一诗人”的称号，他本人却为此感到惊骇。他被安置在专为“苏联作家与诗人”准备的住宅区。他从此停止写诗，开始翻译莎士比亚的戏剧和《浮士德》。1937 年，他没有参加普希金的百年忌日纪念活动。那一年，他的很多朋友消失了：被谋杀，或死在了劳改营里。当斯大林和他的秘密警察开始捕杀那些老布尔什维克时，苏联知识分子协会的成员必须要联名上书，赞美这一举措，并恳求将他们杀得一个不留。帕斯捷尔纳克拒绝签名，并说：“没有人给我决定别人生死的权利。”他曾对朋友表示，他宁愿死也不会签名支持如此“卑鄙的行为”。作家协会的官员对帕斯捷尔纳克的反抗表示震惊，然后伪造了他的签名。

他开始重新投入东正教的信仰，这将他从自杀的念头里解脱出来。讽刺的是，大恐怖反而使他不那么害怕被边缘化了。他发觉，自己对俄国革命的迷恋，以及与苏联文学的结盟，将自己带入了人性价值崩溃的边缘——艺术与道德的共同毁灭。他拒绝了极权的诱惑，不惧结果。他又重新开始写诗，只是不再用“实验性”的“革命风格”体。他的语言开始变得简洁，易懂。作家亚历山大·阿菲诺格诺夫曾在日记中写道：“我会永远记得我与帕斯捷尔纳克的谈话。他会直接和你进入那些巨大、有趣且真实的主题。他的心里只有艺术。他爱人类，并为之痛苦，但他的痛苦里没有泪水。”1941 年 6 月 22 日，德国进攻苏联。这不仅为多年来的国内恐怖再度蒙上阴影，同时也打击了布尔什维克革命本身。战争夺走了大部分俄国仅存的文化精英的生命。1941 至 1942 年间德国对列宁格勒的包围，使大批生长于前革命时期的人死于饥荒。为了取暖，人们烧掉图书馆。与此同时，战争燃



起了知识分子的斗志，给予了他们新的使命。科学家开始致力于研发武器。政府也鼓动艺术家和作家创作爱国口号，来激励人民为国献身。这段时间促使一批旧知识分子重新回归公众视线。他们意识到，在战争状态下，他们并不对革命负责，而是对国家和人民负责。

当德军接近莫斯科时，帕斯捷尔纳克和其他很多诗人作家一起，撤退至俄国东部。几个月后当他回到莫斯科，发现这座城市已经千疮百孔。他的书籍和手稿，包括他父亲的作品，都已消失不见。他因老朋友玛琳娜·茨维塔耶娃的自杀而极度悲伤——那位伟大的俄国诗人刚从移民国家回到苏联。战争导致的灾难和悲剧数不胜数。帕斯捷尔纳克开始阅读苏联新闻，他同情人民的爱国心情和不屈不挠。1943 年，斯大林格勒一战胜利后，他作为战地记者来到前线。他记录下了俄国被毁的城市景象和德军的暴行，并进行了预言性的评论："如果能够改变政治局面，重建俄国城市和原来的幸福生活就好了。但是他们不会这样做的，相反，他们会牺牲整个世界，来挽救当前的政治系统。"

他似乎对身边来自国家主义和种族主义者的仇恨视而不见。其他作家诗人并不似他那般超然物外。伊利亚·爱伦堡，和帕斯捷尔纳克一样也是成长于犹太家庭，很早就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他支持革命，但梦想很快破灭，离开家乡去了巴黎、布鲁塞尔及其他欧洲城市，过着先锋艺术家的生活。当法西斯力量崛起，他回到莫斯科，成为斯大林的非正式外交官，处理国际事务，运用他在欧洲的联系进行反法西斯的联合工作。他将对纳粹的仇恨化为文字，整个苏联军队都敬仰爱伦堡。他写道："杀那些德国人——那是你祖母的愿望。杀那些德国人——那是你孩子的祈求。别让他们过来。杀！"

在战争期间，人们期待着胜利后的美好生活，以及压抑政权的结束。战争阶段有一些悄然的变化，如共产国际的废止、教堂的开放，这让知识分子对未来有了乐观的期望。他们希望恐怖氛围可以消散，文化事物不必再围绕政治中心进行。他们希望当局能够让他们写想写的书，拍自己的电影，上演自己的戏剧。1945 年 5 月，苏联赢得了战争。不过，变革并没有到来，斯大林带领国家进入了对西方势力的冷战，开始了新一轮恐怖时期。

冷战断送了知识分子的美好愿望，他们开始重新把眼光投向外面的世界。在 NEP（新经济政策）时期，能够出国或跟外国联络是一种优待，是只有政权拥护者才可以拥有的权利。但那时，个人申请移民还是可行的。到了 1930 年代，国境则被完全封死了。如果谁想和国外的朋友联络，那是非常危险的。斯大林发动了一项运动，反对"在西方势力面前卑躬屈膝"。他成立特殊"荣誉法庭"，为国际合作和在科学上的文化交流蒙上污名。所有形式上的文化交流都被禁止。俄国知识分子与世界的联系从此中断了近二十年。一位牛津学者以赛亚·伯林曾于 1946 和 1956 年造访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发现这两地最优秀的学者对当代文化艺术和西方的生活方式一无所知。



1930 年代，在政府机构工作的“苏联知识分子”卷入了相互批评和自我审查的运动中。他们全部成为国家政策的“执行者”，其中也包括战争年代的文学英雄。爱伦堡由于自身的犹太背景而备受攻击，但斯大林决定把他留给“文学法庭”。1946 至 1952 年间，爱伦堡像十年前组织的反法西斯犹太委员会那样，帮助苏联政府组织了“和平运动”。也许他是那个委员会成员中唯一一个逃离悲剧命运的人。和爱伦堡一样，西蒙诺夫也是“文学法庭”的一员。1946 年，斯大林将西蒙诺夫派去美国，然后推荐他写一出关于美国暗中挑起对苏冷战的戏剧。西蒙诺夫还不得不主持一场对米哈伊尔·左琴科的公开羞辱。不久后，西蒙诺夫又被迫将攻击矛头指向犹太作家——其中，很多都是他的朋友。

正是在这段时期，又经历了从希望到绝望后，帕斯捷尔纳克开始写作小说《日瓦戈医生》。在二战中，他失去了父母——他们为了躲避纳粹逃到伦敦，其后仍被杀害；他还失去了自己 20 岁的儿子。战后第一年，他爱上了在杂志社工作的奥尔加。他们相处两年后，奥尔加被捕，并送去劳改营。经历了这些事情后，他重新拾起了笔，只是他的笔下出现了新的主题：在暴力革命期间，俄国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

1953 年 3 月 5 日，斯大林去世，百万人哀悼，却没几个人知道就在同一天，俄国作曲家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去世。这对俄国文化的未来是一个不祥之兆。在苏联知识分子当中，没有创作自主权，更不用说脱离政权的独立创作权利了。所有的作品和文化活动都要在国家和秘密警察的监控下进行。而作家和诗人似乎已经遗忘了如何去思考和自由地写作。艺术家无法表达他们的真实感情，电影导演则被要求拍摄粗糙的宣传片和低俗的闹剧，知识分子独立自由的梦想似乎只是无望的美梦而已。

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在战后的文化沉默中发出了第一丝声响。在《日瓦戈医生》中，那位医生——同时也是神秘的诗人和理想主义者——拯救人的性命，并试图寻回生命与爱的意义。主人公尤利·日瓦戈在教育良好的环境中长大，并失去双亲，很多细节都与帕斯捷尔纳克的生活经历相似。尤利的生活环境崇尚古典俄国文化，对推翻沙皇统治充满希望。尤利娶了冬妮亚，但经历了一系列生活变故后，他遇到了他的真爱拉拉。尤利对政治不感兴趣，也不想投身革命，但是革命将他卷入其中，影响到了他的家庭与爱情，为他造就了无数悲剧。命运只给了尤利与拉拉几个星期的快乐时光，很快内战就将两人分开，不久后她就移民离开俄国，永远从尤利的生活中消失了。尤利几次身处死亡边缘，命运又机缘巧合救了他。小说的结局发生在 1920 年代，那时的尤利疾病缠身，毫无名气。他身处一辆拥挤的电车内，相信自己在车窗外看到了拉拉。他向她奔去，却因心脏病发作猝死。《日瓦戈医生》的最后几页，讲的是尤利死后，他在战争和恐怖时期活下来的朋友遇见了尤利的孩子塔尼娅。塔尼娅作为孤儿在农村长大，远离文化社会。她没有机会继承他父亲的自由思想和创新精神。帕斯捷尔纳克没有将这个孩子的命运讲述下去。她在书中的浮光掠影令读者思考，是否俄国知识分子的文化遗存已经毁灭殆尽。



1956 年，帕斯捷尔纳克不顾苏联政府的胁迫及反对，将《日瓦戈医生》的书稿送往几家外国出版社。在书出版之前，当局已经开始恐吓他。他的爱人奥尔加，即拉拉的原型，刚刚从待了七年的劳改营归来。为了让帕斯捷尔纳克不要冒险，她对他说："这样做，你不但搭上自己的性命，还会搭上我的。"但是帕斯捷尔纳克依然坚持："如果真相只能通过痛苦来得以揭露，那么我愿意受任何苦难。"

1957 年 11 月 23 日，《日瓦戈医生》在米兰出版。这部小说一夜成名，被翻译成多种语言。1958 年 10 月，帕斯捷尔纳克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在美国，《日瓦戈医生》的译本蝉联"纽约时报图书榜"销量冠军超过半年之久。在斯大林之后继任的赫鲁晓夫非常愤怒。苏联作家协会诋毁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认为它们破坏了俄国的文学传统。赫鲁晓夫和其同僚甚至不用读这本小说，就把它定义为西方冷战势力的挑拨。他们裁定这本小说是"境外势力的工具"，苏联作家集体联名发表公开信，谴责帕斯捷尔纳克的所作所为是"受境外势力指使的文学毒草"。帕斯捷尔纳克发觉自己身处极大的压力之下，国内各界都在逼他忏悔，而与此同时，全世界数以千计的知识分子和公众人士则都在表达对这位被围困的作家的支持。1959 年 7 月，他写下了一首诗，作为回应：

我错在何处？

我杀了人么？

我只是写下了我美丽的故土，

并让全世界为之悲悯。

（本文译者：董帅）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11-2 王淼：纪德看到了什么——读《访苏联归来》

王淼，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

“

1934 年，纪德发表了自己的《日记》散页。他在其中这样写道：“（我）盼望活得够长久，看到俄国的计划成功，看到欧洲的国家对着他们硬是不承认的事实俯首无言……我从来没有抱着这么大的热忱注视未来，我由衷地赞同这个巨大却完全人道的事业。”

”

1936 年 6 月 17 日，六十七岁的法国作家纪德接受苏联政府的邀请，正式开始了他历时两个多月的苏联之行。纪德访苏归来的三个月后，即同年的 11 月，他的苏联游记《访苏联归来》写成问世，一时之间，在东、西方世界掀起轩然大波。

要想真正弄清纪德对苏联的真实看法以及他访苏归来之后的所思所想，我们首先需要对纪德访苏之前的思想状况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一个世界形势变幻、波诡云谲的时代，世界大战的威胁与经济危机的阴影，使得生活在西方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普遍陷入了一种生活困顿与精神迷茫的状态之中。正是出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失望与不满，那些具有正义感的西方知识分子，开始在焦虑与不安的情绪中试图去寻找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来取代在他们眼中业已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而彼时的他们，则纷纷将自己的目光聚焦在年轻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身上——安德烈·纪德无疑即是这些知识分子中的一员。

作为一位知名作家，纪德身上有着浓郁的自由主义色彩，他的左翼情结也由来已久。鉴于西方社会的现状，纪德开始对马克思的著作产生浓厚的兴趣。而他的非洲之行，则让他亲眼目睹了民族之间敲诈勒索的残酷现实。那种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给他的心灵带来了难以想象的触动。所以，纪德既被《资本论》中的道义力量所打动，同时，他也执著地相信“马克思主义付诸实施，无产阶级专政，通过建立一个新社会，可以使人飞跃发展”。他甚至进而认为，世间无疑存在一种毕其功于一役的社会解决方法，能够一劳永逸地避免人剥削人所造成的人间惨剧。纪德不无欣喜地看到，终于有一个国家拥有了这样的真理，这个幸福的国度就是苏联。1934 年，纪德发表了自己的《日记》散页。他在其中这



样写道:“(我)盼望活得够长久，看到俄国的计划成功，看到欧洲的国家对着他们硬是不承认的事实俯首无言……我从来没有抱着这么大的热忱注视未来，我由衷地赞同这个巨大却完全人道的事业。”次年 6 月，纪德与另一位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一起，参与筹建了极具左翼色彩的国际作家保卫文化大会。在该会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他和罗曼·罗兰双双进入了由十二位重要成员所组成的大会主席团。

苏联官方对纪德的举动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们敏锐地觉察到这是一次争取国际舆论支持，并借以摆脱孤立处境的机会。就在纪德公开发表支持苏联的言论期间，苏联政府曾经多次邀请纪德访苏。纪德本人在经过了一番犹疑之后，方慎重地提出与五位朋友共同出访的要求。苏联政府很快接受了这个条件。一切准备就绪，纪德在作家希夫林·吉尤、杰夫·拉斯特、欧仁·达比，以及曾经在莫斯科住过两年之久、精通苏联各项事务的皮埃尔·埃巴尔等人的陪同下，正式开始了访苏的行程。纪德本人无疑非常重视这次苏联之行。在日后的追忆中，他仍然坦言这次旅行在自己“一生中起着巨大的作用，这肯定是大精灵之一”。但他同时也明白，自己这次行程将要记下的也未必都是歌颂苏联的话语。的确，他虽然是抱着去亲眼目睹“所有国家中最幸运的国家”的目的前往苏联，但他也极有可能会面对一个他并不希望看到的现实。不管怎样，纪德总算得到了一次验证自己理想的机会。无论是好是坏，他都要正视自己即将看到的那个“榜样”与“向导”，却决不能昧着良心去信口雌黄——“只有真实可靠的才可以接受，一切神秘论调都要从那里赶走。”纪德在自己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作为一位作家，纪德在苏联所受到的礼遇之隆，是他本人也万万没有想到的。他享受到了只有国家元首才能够享受到的待遇。从纪德踏上苏联国土的那一天起，他就非常惊诧地发现，自己已经处于鲜花与掌声的包围之中了。他的足迹所到之处，一定会有盛大的欢迎仪式，随之而来的即是地方行政官员全程陪同的参观和游览。大到一座城市，小到一个村庄，只要是纪德经过的地方，到处都悬挂着五颜六色的彩旗，上面写着“欢迎安德烈·纪德，法国最伟大的作家!”更让纪德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当他走进一个剧场时，正在演出的戏剧竟然也会马上中止，全体观众起立，在法国国歌《马赛曲》的伴奏下向纪德致意。值得一提的是，纪德还很荣幸地被邀请参加了高尔基的葬礼。他不但走上了设在红场的高尔基追悼会的主席台，与斯大林、莫洛托夫、米高扬等苏联领袖们站在一起，甚至还亲自为高尔基致了悼词。当纪德站在红场高处，凝望着如此壮观的场面，凝望着下面川流不息的人群时，他既为苏联感到骄傲，同时，也感受到了一种在任何别的地方从来没有感受过的人情味。他觉得，那是同志加兄弟的真正情谊。他说:“我们的思想中是把文化的命运和苏联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我们要捍卫苏联。”“为了它我可以放弃世界上最美好的景致。”至少从表面看来，苏联的一切都显得那么井井有条、那么高尚、那么完美，但是，随着游览的不断深入，纪德仍然凭着自己的直觉感到了其中的虚假。很显然，他们每

天的日程都是策划好的，见什么人，不见什么人，该看什么，不该看什么，也明显经过了一番精心的安排。在纪德眼中，这里的社会虽然看起来的确像一个人类的乐园，但人们的所作所为却总是带有一种表演的痕迹。而且，随着时间流逝，这样的蛛丝马迹也开始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这让纪德感到了深深的不安。

终于，纪德寻找到一个可以打破官方安排的机会。那是在从莫斯科到奥尔忠尼启则去的列车上，纪德一行本来有自己的包厢，但他们却通过与列车员的交涉，与另外车厢中的一群到高加索去度假的共青团员交上了朋友。在与他们无拘无束的交谈中，纪德既被这些年轻人的热烈情绪所感染，同时，也深为他们对外面世界的无知，以及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而感到惊讶。如果说这次偶然的相遇还让纪德对自己的所见所闻充满了疑惑，那么，纪德以后的经历则让他完全证实了自己的判断。有一次，当纪德询问一位大学生的外语成绩如何时，他竟然听到了这样的回答："几年以前，德国和美国还有东西可以让我们学学。但是，现在，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向外国学习的了。因此又何必去讲他们的语言呢?"对此，纪德在自己的游记中作了如是评价："苏联公民对外国的无知非同一般。更有甚者，苏联公民被告知国外各方面一切都不如苏联。他们巧妙地让苏联人保持了这种幻觉。因为重要的是让每个人庆幸自己处于让他免遭更不幸的痛苦的政权之下，即使这个人并不很满意。"也正是基于这种见闻，纪德认为，由于阻止了和外界的联系，苏联人的幸福实际上是建立在期望、信任和无知之上的。于是，纪德进而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种文化完全朝着同一方向，无公允可言，涉及各个方面，几乎完全没有批评精神。"

应该承认，纪德的眼光是非常锐利的。虽然纪德在苏联只有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面对的是一个经过了层层美化之后的现实，但他还是通过自己的观察与分析，看到了苏联政治隐秘的另一面。而他游记的笔触也同样涉及苏联社会的各个层面。在莫斯科，纪德这样记录了自己的观感："在任何地方都不会像在莫斯科的街上让人如此感到社会平均化的结果：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每个人的需要似乎都是一样的。……人人都异乎寻常地穿得一样。如果能够看到人们的思想的话，无疑地这种千篇一律也一定反映在人们的头脑里。也正因为这种一致，每个人能够快乐，并且表现出快乐的样子。"同样是出于绝对平均化的结果，苏联人对于商品的需要也显然不是为了满足个人的喜爱，而只是为了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因而，"那些商品几乎都不堪入目，简直让人以为这些商品是尽可能地为了倒人胃口而制作的"。苏联人的住宅也好不到哪里去，里面除了千篇一律难看的家具和同一张斯大林像外，其他几乎一无所有，"没有一点点个人的东西，没有一点点私人纪念品"，以致"每一住所都是一模一样，完全可以互换，连集体农庄的庄员们也是一模一样，可以调换，如果他们互相换一下位置也不会被人察觉的"。当然，令纪德感到震惊的还远远不止这些，在他看来，最不可思议的个人崇拜在苏联人眼中竟然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纪德所到之处，无论是公共场合还是私人住宅，"到处都悬挂着斯大林的头像，人人嘴上都挂着他



的名字，每一个人的讲话中都无可遗漏地颂扬他”。在斯大林的故乡戈里，纪德曾经有过一次这样的经历。他出于礼貌发一份电报给斯大林，对自己在苏联受到的接待表示感谢，只是因为电文中没有加上“您，劳动人民的领袖”，或者“各族人民的导师”的字样，营业员竟然拒绝拍发。直到纪德妥协之后，电报才如愿发出。这些记述很容易让人想起“反乌托邦三部曲”中的类似情节。但纪德的文字不是想像力的产物，而是活生生的现实。虽然他的确无心讽刺，但他的文字却具有更加深刻的讽刺力量。

如果说上述记录触及的仍然只是苏联人的日常生活表象的话，那么，无疑纪德已经开始透过这些表象，逐渐触摸到苏联政治的实质。通过与苏联文化界与艺术界人士的接触与交流，纪德发现，“在苏联，不管一部作品多么美，只要它不紧跟路线，它就会遭到羞辱。美被看作是一种资产阶级的价值”。一旦有人不同意使自己的艺术堕落，并拒绝俯首听命，官方就会迫使他们保持沉默。而一直就被苏联官方所竭力吹嘘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其实质也不过是相互揭发与相互指责，“在线内可以任意批评，出线的批评是不允许的”，“谁企图走得远一点谁就会遭殃”，“众人的幸福是以每个人的非个性化取得的，众人的幸福是以牺牲个人而得到的。为了得到幸福，就得听话、随大流”。于是，在苏联文化界，你根本听不到任何不同于主流观念的声音，艺术家的思想已经被消磨得没有棱角，奴性与虚伪竟然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之常态，同时也是他们的个人利禄之所系，因为他们只有听话，才能有所收益，只有“思想对路”，才会进入日益膨胀的特权阶层，乃至最终从平均主义的樊笼中脱颖而出，成为国家的新贵。

对于纪德而言，他在苏联的所见所闻，与他当初的理想大相径庭。这一点已经是毫无疑问的了。不过，客观地说，纪德的《访苏联归来》却仍然写得相当节制，这一方面是因为纪德对自己的观察有点半信半疑，另一方面，他对苏联的制度尚存在一定的幻想，对乌托邦社会的热情也并没有完全熄灭。纪德在前言中这样说过:“三年前，我公开宣布我赞赏苏联、我爱苏联。那里正在进行一场前无古人的尝试，使我们心中充满了希望。我们期待着那里取得巨大的进步，出现能够带领全人类前进的飞跃。”可见，在纪德眼中，苏联所施行的各种社会制度，其实均是带有一种试验性质的。既然苏联的各种制度正处于“建设之中”的实验阶段，那么，那里就难免会“有好的地方也有坏的地方”，有时即使“花了努力并不一定总是取得预期的效果”，乃至“最不好的负面效应伴随着最好的正面效应”，都应该属于情理允许的范围之内。毕竟，从最光明到最阴暗的过渡就像是一次分娩的过程，阵痛是难免的，代价也是必须付出的，正如苏联正在施行的闭关政策，那只是因为“在建立新秩序以前，在情况得到改善以前，为了苏联居民的幸福起见，重要的是将这种幸福保护起来”。但纪德终于还是不无沮丧地发现，自己对于苏联的谅解之词往往并不能自圆其说，他看到的苏联是单调的、令人窒息的，专制社会所有的特征在这里竟然一点也不缺少。虽然在这里“实行专政是显而易见的，但那是一个人的专政，不再是团结起来



的无产者的专政，不再是苏维埃专政”。而且这种专政的目的只是为了消灭个体之间的差异，把个人改造成为傀儡，以利于大一统的专制统治。纪德在经过了反复对比之后，不得不承认这样的现实:“事情往往如此，我们只有在失去了某些优势之后才认识到它们的价值。在苏联逗留过，更有助于我们体会到我们在法国享有的无可估量的思想自由，而我们有时还自由得太过分了。”

离开苏联前夕，纪德已经陷入了深深的焦虑之中。他不知道自己应该如何应对法国人民的询问，因为那些对苏联依然抱有殷切希望的人们，无疑都在等着他作出鲜明的评判。是实话实说，还是避重就轻?不管怎样，苏联政府为了取悦纪德，已经用尽了他们能够使用的一切手段，仅仅是版税一项，已经足够让纪德成为亿万富翁了，更何况纪德还曾经那般地赞美苏联、并一再声称把人类“文化的前途和苏联的辉煌命运联系在一起”呢?但纪德毕竟是一位充满良知的知识分子，他既无法欺骗自己，同时也更不能欺骗自己的读者，根本无法保持沉默。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心使然，其中并不存在个人的自尊心和任何私念。所以，纪德一旦发现了自己的错误，他就要为自己的错误承担责任，因为他所要捍卫的从来都是象征着真理的苏联，而并不是苏联自身。在他的眼中，远比苏联更为重要的事情是人类、人类的命运、人类的文化——纪德之所以赞美苏联，是为了人类，人类的命运，人类的文化。纪德了解真相后批评苏联，显然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当然，纪德批评苏联的态度是相当友好的，也是充满善意的，他只是想以诤友的身份进言，因为他觉得只有毫无保留地坦诚相见，并把那些最有害的事情充分显示出来，才是对苏联及其所代表的事业最为切实有效的帮助，反之，所有的吹捧与献媚最终都会转变成为一种危害。他说:“我是出于对苏联及它已完成的奇迹的赞赏才提出我的批评。我也是出于我们对它依然怀有的期望，尤其是因为它让我们有所希望，才对它提出批评的。”但是，让纪德始料未及的是，他自认为对苏联的帮助只不过是他的一厢情愿而已。《访苏联归来》刚刚问世，他本人马上就陷入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围攻之中。苏联官方将他视作背信弃义、忘恩负义的小人。而那些昔日志同道合的朋友，则对他落井下石、疯狂围剿，极尽侮辱、漫骂之能事。甚至连罗曼·罗兰也不能原谅他。这位同样看清了苏联真实面目的著名作家，竟然选择了放弃自己干预现实的权利，在宗派利益面前，将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抛诸脑后——直到罗曼·罗兰逝世五十周年之后，他的《莫斯科日记》才公布于世，他个人对苏联的真实看法才大白于天下。而此时的苏联却早已烟消云散。当然，让纪德更为愕然的还是苏联的反应。他根本无法相信在苏联强大的外表之下，竟然掩藏着一个如此弱不禁风的躯体，纪德心目中的那个“能够创造出想不到的光荣业绩的超人”就此死去，而他对社会改造所一直抱有的毕其功于一役的幻想，至此亦彻底宣告破灭。

就在世人对纪德的人身攻击方兴未艾时，纪德已经开始对《访苏联归来》的第一版进行全面修订。彼时的纪德已经真正看清了专制社会的本质，进而对一切乌托邦社会反人类

的实质也有了更加清醒的把握。他的《“访苏联归来”之补充》几乎涉及了苏联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从更加广泛的层面和更加深刻的视角，全面展示了苏联社会的黑暗。他说:“苏俄是普及谎言的，在那里，甚至连眼睛都可能受骗。”他说:“俄罗斯不是一个提出诉讼的地方。但是，西伯利亚的确是个流放的地方。”他说:“在今天的苏联，人民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不幸，比任何国家都更加缺乏自由。”面对着世人的责难与围剿，这，就是纪德的回答。

((法)安德烈·纪德著，朱静、黄葆译:《访苏联归来》，花城出版社 1999 年 7 月第 1 版)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11-3 瞭望新闻周刊：镜鉴：苏联 1977

左凤荣，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国际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教授，兼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业（苏东剧变问题研究、世界社会主义的现状与前景方向）博士生导师。

“

1970～1980 年代初是苏联历史上一个少有的、稳定的时代，但在表面繁荣的背后却危机暗藏，致使苏联社会失去了自我更新的能力。

”

1977 年是十月革命胜利 60 周年，11 月 7 日，苏联举行了隆重的纪念仪式，在声势浩大的群众游行队伍中，第一次出现了和列宁像制式、大小一模一样的勃列日涅夫肖像，站在列宁墓观礼台上的勃列日涅夫喜不自禁。

1977 年对于苏联而言，也确实是重要的一年。10 月 7 日苏联第九届最高苏维埃第七次非常会议通过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根本法)》。在此之前苏联全民就此宪法进行了公开讨论，尽管民众的意见大都未被吸收，但该事件本身给人的印象是苏联是很民主的国家。该宪法强化了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写进了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向世人描述了苏联发达社会主义的盛况:在苏联共产党这个核心的领导下，“工人阶级、集体农民和人民知识分子的联盟加强了，苏联各民族的友谊巩固了。以工人阶级为主导力量的苏联社会的社会与政治一致和思想一致形成了。苏维埃国家已经完成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它已成为全民的国家。”“苏联已经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在发展的这个阶段，越来越充分地显示出新制度的创造力和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优越性，劳动人民越来越广泛地享有伟大革命胜利的果实。”“这个社会已经建立起强大的生产力、先进的科学和文化，人民的福利不断提高，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越来越有利的条件。”强大的背后当时苏联确实有其值得骄傲之处:在 1975 年赫尔辛基会议签署的《最后文件》中，苏联战后取得的成果，特别是苏东国家的边界得到了最终确认。苏联与美国的差距缩短，基本达到了与美国平起平坐的目的，在某些武器装备上苏联甚至还处于一定的优势地位。这一时期苏联社会稳定，没有出现大的动乱，由于柯西金改革的刺激，1966~1970 年的第八个五年计划是自斯大林时代以来最成功的一个五年计划，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收入增长了 15%，农业产量增长了 21%(上一个五年计划只增长 12%)，工业增长了 50.5%，居民收入增加了 50%，集体农庄庄员也可以每月领工资了。第九个五年计划(1971~1975)工业总值增长 43%，农业增长 13%。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统计数据表明，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的 1965 年，苏联人的平均工资只有 96.5 卢布，到了其执政晚期上涨到 170 卢布。



很多苏联人在这段时间内搬进了属于自己的住房，到 1980 年有 1 亿人改善了居住条件，购买了像样的家具、服装甚至汽车。

但是，苏联的强大有其潜在致命的弱点。尽管苏联在宇航、核武器和军事技术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但整个经济水平低于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比美国低一倍，苏联从美国进口的粮食要比在国内生产的便宜一倍。1979 年苏联生产的产品总额不超过美国的 60%。到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苏联人均 GDP 只相当于美国的 37%，处于发展中国家的水平。1980 年代初，苏联人均消费水平在世界上排名第 77 位，苏联的医疗保健开支只占国民收入的 4%，而在发达国家占 10%~12%。苏联这个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却养活不了自己，只有 1966 年、1973 年两年苏联粮食能够自给。1975 年进口 1590 万吨，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进口国。

五大隐患

苏联在 1970 年代中期达到顶峰后便一路下滑。苏共在争吵中庆祝了十月革命胜利 70 周年，却未能庆祝 75 周年，1991 年底苏联这个超级大国解体了。回头看，勃列日涅夫对此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正是他安于现状、好大喜功、在稳定的口号下坐失了改革的良机，积累了大量的矛盾与问题，为苏联解体埋下了隐患。

其一，勃列日涅夫把主要精力放在了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上。

1967 年苏联有洲际弹道导弹 570 枚，美国有 1054 枚，到 1979 年美国仍是 1054 枚，苏联增加到 1409 枚。同时生产了数量过多的核武器。这一时期美国军队从 350 万人减少到 206 万人，苏联军队则从 368 万人增至 419 万人。军事工业集团、军方势力的影响膨胀，在国家机器制造业的全部产品中，有 60%以上是具有军事意义的产品，耐用消费品的比重仅占 5%~6%，75%的科研经费被用于满足军事的需要，采掘和加工工业全部工人的 1/3 从事武器及军事技术装备生产，而美国为 12%~14%，西欧各国为 6%~7%。苏联对外奉行进攻性战略，与美国进行全球争夺，甚至出兵入侵阿富汗。苏联在世界上扩张，也是不计经济效益的。

人们需要的生活必需品长期短缺，人民的需求与国家经济能力之间的矛盾突出，出现了在边远地区只向几类居民(哺乳妇女、参加过战争的老兵、重病患者)凭票供应某些食品的情况，到上世纪 80 年代初，在大多数地区都如此，只有莫斯科、列宁格勒、加盟共和国的首都和一些有特殊意义的城市，情况好些。

其二，在稳定的口号下，勃列日涅夫拒绝改革并压制创新。

勃列日涅夫反对柯西金的改革。苏联经济体制的无效性日益显现，经济进入停滞状态，速度逐年下滑，第九个五年计划和第十个五年计划都没有完成任务。1973 年石油危机



后，世界石油价格提高了 19 倍，原料价格提高了 7~9 倍，苏联靠出卖原料获取了巨额收入，在国民经济中原材料工业占的比重高达 40%。苏联经济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严重依赖石油和天然气出口。苏联错过了科技革命，电子计算机、机器制造、机器人技术处于落后状态。

思想上的教条主义和保守主义占上风。1967 年，勃列日涅夫第一次提出发达社会主义概念，1971 年这一掩盖矛盾、粉饰太平的理论被苏共二十四大所确认，后来又写入了苏联宪法。勃列日涅夫认为苏联一切都完美，与苏共观点不同的人精神有问题。于是，许多人被送进了精神病院。一些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和对苏联现实有意见的人被打成持不同政见者。在苏斯洛夫的领导下，当时意识形态的高压政策和严格的新闻检查，遏制了创新，苏联的精神生活也停滞了。

其三，干部终身制和老人政治严重，形成了稳定的居于各级领导地位的利益集团和官僚特权阶层。

勃列日涅夫掌权的秘密，首先是干部的稳定和终身制，主要是高级官员等“在册权贵”地位与利益的稳定。他上台后废除了赫鲁晓夫时期规定的领导职务任期制和轮换制，实行领导职务终身制，使拥有特权的群体逐步定格，并且形成相互依存的社会网络。正是在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苏联社会终于从最初的某些官员拥有某些特权，演变成相对稳定的社会特权阶层。苏共实际上已成为这一阶层的利益代表。

干部队伍超常规的稳定，造成了高层长期无法输入新鲜血液，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老人政治。1976 年夏天勃列日涅夫中风，难于正常工作，但在干部终身制的体制下，他仍掌握着最高权力，从 1966 年苏共二十三大到 1981 年苏共二十六大，苏共中央委员实际连任率达到 90%。政治局和苏共中央书记处成员在 1971~1981 年平均年龄从 60 岁提高到 68 岁，其中许多人患有重病。

国家的停滞却是“在册权贵”的繁荣时期。“挑选干部不是根据职业素质和成绩，而是根据候选人是否善于处理好同高层人物的关系，是否善于在党的各级机关建立人情关系。”他们从为国家服务的阶层变成了试图完全控制国家和社会的独立的政治力量，成了苏联的统治阶级。勃列日涅夫和地方的封疆大吏们都按照对自己的忠实程度提拔亲信，排斥异己，逐渐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帮派势力。以前党的工作人员、国家工作人员和经济界领导人大多数都来自业务能力表现突出的普通民众，但 1970~1980 年代，精英的增补通过特殊的选拔和培养干部的系统:高级党校、团校、工会学校、社会科学学院、外交学院进行，进入这些学校只能靠有影响的官僚的推荐。评定直接取决于领导们个人喜好和政治考虑，业务素质很少被考虑，正直性和原则性通常最有可能成为升迁的障碍。许多地区同乡关系



和裙带关系发展，长官的子女和其他亲属独立生活后一开始就处于特殊的地位。勃列日涅夫的儿子是外贸部第一副部长，女婿是内务部副部长，连襟领导着机器制造部。

其四，社会风气失控，贪污、腐败和特权达到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步。

由勃列日涅夫带头，授勋、送礼、崇尚奢侈成风，他本人生活非常奢侈，在扎维多沃的猎场花费了数百万卢布的国防开支，并且在莫斯科郊外至少还有六栋别墅。

其五，苏联没有很好地处理与世界的关系。

1970 年代美国对苏实行缓和政策，向苏联提供技术和资金，以换取苏联延缓扩张的势头，成为国际体系的一员。但对抗思维仍然压在苏联领导人心头，他们仍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全面对抗出发分析任何事，苏联借此全力发展武器和对外扩张，坐失了良机。

总之，1970~1980 年代初是苏联历史上一个少有的、非常稳定、祥和的时代，但只是表面繁荣的时代。稳定转化成停滞，苏联社会失去了自我更新的能力，促使几十年积累的矛盾和危机在 1980 年代末期来了个总爆发，最终导致苏联这样的超级大国出乎意料地轰然倒塌。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破】

11-4 金雁：誓言与暴力



金雁，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苏联一俄罗斯、东欧问题研究专家。

“

出版界在俄国历来被誉为“革命的母亲”。布尔什维克党认为，对“革命的母亲”进行限制，是所有统治阶级最愿意干的一件事。然而，当他们自己走上权力舞台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拿“革命母亲”开刀。

”

革命与变形之二:“革命母亲”之死

在对待出版自由的问题上，列宁曾经发誓革命胜利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做到新闻自由。他认为，争取政治自由是社会主义者的当务之急。他说，“那种为了虚幻的经济利益，而离开争取政治自由这一俄国社会党人最直接、最重要的任务的图谋”实际就是“背叛伟大的社会革命事业”。他常说，比民粹派“土地与自由”更加明确的政治口号“应当是政治自由”，是否坚持“政治自由”是当时辨别马克思主义与经济主义、工联主义的标志性区别。抛弃了这个原则，就“完全等于抛弃了社会主义”。这时他特别喜欢马克思的一句话:“没有出版的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托洛茨基在革命动员的时候更是大声呼吁道:“捍卫言论自由对工人来说，言论自由就是面包，就是空气”。出版界在俄国历来被誉为“革命的母亲”。布尔什维克党认为，对“革命的母亲”进行限制，是所有统治阶级最愿意干的一件事。然而，当他们自己走上权力舞台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拿“革命母亲”开刀。

与列宁誓言相反的是，十月革命的第二天，布尔什维克就颁布《关于出版的法令》，建立了临时的书报检查制度。在法令中明文禁止反对派的出版自由，把一切不属于自己控制的、反映不同声音的报纸都说成是“毒害大众心灵并使群众意识发生混乱，……危害性甚至超过炸弹和机枪”的“资产阶级最有力的武器之一”。以后出版业很快被国有化，只有党所认可的“工人阶级的组织”才有使用印刷设备和纸张的权利。对这种做法，列宁解



释说，出版和集会自由这类“纯粹的民主”是骗人的鬼话，“我们向来不承认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

卢森堡对此曾尖锐地批评道:“只有仅仅予与政府的支持者和一党成员的自由，就不是自由。自由应当总是对于那些持有不同想法的人而言的”，“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集会等自由，公共生活就会逐渐死灭，就只能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雅各宾派统治意义上的专政”。而列宁却反唇相讥道，暴力夺取政权必然要用暴力来维持，任何阶级都没有“彻底的民主”和“无限制的公开性”，“资产阶级在全世界还比我们强，强很多倍，再让它有建立政治组织的自由这个武器，那就是为敌人的活动开方便之门”，“我们不愿自杀，因而决不会这样做”。到上世纪 20 年代初，任何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都被认为是“致人死命的药”和“自杀行为”。

即便如此，当时党内的卢那察尔斯基、党外的高尔基都曾对俄共的书报检查制度的专横粗暴做法表示过愤慨，他们大力呼吁尽快出台正式的出版法加以规范和限制权力对新闻出版业的干预。高尔基曾以放弃俄国国籍来抗议布尔什维克践踏新闻自由、取缔其他党派的报纸，高尔基质问道:布尔什维克半年取缔的报纸比整个沙皇时代加起来还要多，为什么害怕与自己不同的意见，难道要把社会公众的思想也要变成国有的吗?要把国家变成巨大的监狱吗?

革命与变形之三:“消灭劳动自由”

在对待工人罢工的问题上，革命前列宁曾发誓一定要给“工人集会、结社和罢工自由，废除身份证，流动和迁徙完全自由”，并把这一条作为社会民主党争取政治自由的具体条款写入党纲。列宁说:俄国“工人如果不能像西欧工人那样享有自由集会、结社、办报纸、派代表参加人民的集会这些权利，那么任何经济斗争都不能给他们带来持久的改善”。“争取政治自由”是“工人的迫切事情”。托洛茨基说，沙皇专制是“微不足道的少数人支配大多数人的劳动和生命，他为了自己的利益把军队投入杀戮。”他又对临时政府说，凌驾于工人民主之上的政府是工贼。

然而十月武装夺权刚刚落下帷幕，1917 年 12 月，彼得格勒的印刷厂工人罢工，列宁立刻下令，把罢工工人当作流氓处理，他认为苏维埃政府太软弱了，下令对公民实行“等级与监督”以刑罚作为威慑手段，强迫所有的人劳动。他说:“这个等级与监督制度的目的很明确，也通俗易懂，每个人都应当有面包，……无赖(包括任何想要逃避工作的人)都不得闲逛，而应该关在监狱里，或是从事最沉重的强制劳动服满刑期，这些无赖的命运也理所应当是富人的命运——所有试图规避社会主义规定与法律的富人都该有同样的下场”。从此，在列宁式的体制下，任何乞丐、流浪汉和“盲流”，都被归入“无赖”之列;而如果“不服从分配”老老实实干派给你的活，更不用说还要罢工，那就更是“流氓”。哪怕你



身无分文，也与“资产阶级——富人”一样要受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惩罚。1917 年 12 月 25 日，列宁在《如何组织竞赛?》一文中再次强调，必须铁腕镇压罢工的工人，即所谓“流氓”。“富人和流氓是同一硬币的两面，他们是资本主义哺育出来的两种主要寄生虫，他们是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这些敌人必须置于全民的特殊监督之下，必须为他们最轻微的违反社会主义的法律和规定而受到无情的惩罚，在这方面表现出人性的软弱、犹豫或温情脉脉，都是对社会主义极大的犯罪”。

我们知道，西欧一些国家当年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也出现过抓捕流浪、乞讨者并施以强迫劳役的法律，即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痛斥的“血腥立法”。由于下层人民的抗议，这些恶法在英国等地到 19 世纪前期均已被废除，以至于我们现在可以讥笑西方发达国家居然还有流浪汉。但马克思万没想到的是，这种“血腥立法”在号称是以他的思想为指导的国家却重现了，而且变本加厉。

这种苏维埃式的“血腥立法”以所谓的“劳动义务制”为依据。所谓“义务”是与“权利”相对而言。自由人有做某事的权利，即“想做某事则别人不得阻拦，不想做也可以不做”;而相反的状态，“无论愿意与否，都必须做某事”则意味着做某事成了必须履行的义务，没有不做的自由。在欧洲左派运动和劳工运动的传统中，劳动被视为劳动者的神圣权利，工人要求职业保障，失业者要求得到就业机会，资本家不得随意开除工人，这就是在争取劳动权利。但是“劳动义务”或曰强制劳动则只有奴隶制或农奴制下才存在，自由的工人有罢工的权利，当然就不可能被强加以“劳动义务”。尽管在劳工运动中也曾有人把反对“剥削”、反对“不劳而获”的意思表述为“劳动义务”，但其所针对的通常只是富人和权势者，意在制止他们通过经济的或“超经济”的(即政治上的)强势地位去剥夺劳动者，而从来没有针对穷人、弱势群体和工农讲“劳动义务”、主张像农奴制时代那样对民众实行强迫劳动的。

尤其是无偿的劳动，在文明社会通常不会具有强制性，而只能是高尚公民出于公益心志愿从事的一种奉献行为，所以称为“志愿者”，他们是自愿奉献，当然就不能说是什么“义务”劳动。

但是布尔什维克掌权后，却开始宣传针对民众的“劳动义务制”。当局大肆批判“劳动自由”，认为那是资本主义的特征。苏俄理论家布哈林声称:“必须消灭所谓劳动自由，因为‘劳动自由’是同正确组织起来的‘计划’经济和劳动力的计划分配不相容的”。所以，必须用“无产阶级专政下实行劳动义务制和国家分配劳动力的办法”来取而代之。这种“专政下的生产管理体系”，可以是有偿的“劳动军”，也可以是无偿的“义务星期六”，但都以军事化的强制为基础。在他那本极有影响的《过渡时期经济学》中，布哈林就专列一章曰“过渡时期的‘超经济’强制”，他指出，“专政”决不仅仅意味着对“阶



级敌人”的强制:“用于工人阶级自身的新型的主要强制形式之一，是消灭所谓劳动自由。”于是，1920 年代的苏联曾特别流行以所谓“无产阶级的超经济强制”组织劳动、用“阶级斗争”和“专政”手段对付“落后工人”的说法。

对流浪者可以抓起来劳改，星期六无酬干活成为强制性“义务”。在这种“专政下实行的劳动义务制”下，当然不可能存在什么罢工权利。布哈林驳斥了那种认为布尔什维克将增加罢工自由的“资产阶级教授的谣言”，他说:“在实行劳动军、星期六义务劳动和劳动纪律的年份还发出这种叫声，难道不可笑吗?”不给报酬的白干都成了强制性的“义务”，更何谈发了工资你还要讨价还价?!

而列宁的说法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称，工人罢工是“小资产阶级的涣散毛病”，“即使在苏维埃印刷所的排字工人中间，在索尔莫夫斯克和普梯洛夫工厂(按:这两家工厂是著名的”红色堡垒“，”十月革命“时工人赤卫队的发源地)的工人中间，这样的坏蛋难道还少吗?”按列宁的说法，这些人视国家为雇主，按照革命前工人的“习惯”，“替‘它’干活要少些差些，从‘它’那里捞钱则多多益善”，而“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难道不正是要反对”这些“工人、工人集团、工人阶层”吗?无怪乎读到这类话的人说:列宁实际上是“以劳苦大众的名义对劳苦大众使用暴力”。

于是几乎从“革命”一成功起，俄国就不断发生镇压罢工的严重事件。

1918 年从 2 月到 10 月物价上涨，通胀率达到 258%，第二年在这个基础上又翻了一番。为表示抗议，1919 年 3 月 16 日，当年作为“十月革命中心”的彼得格勒普梯洛夫工厂工人发生罢工。特别委员会立即出手镇压，逮捕了 900 人，此后数日内未经审判处决了其中的 200 人。1919 年春图拉、奥廖尔、特维尔、伊万诺沃和阿斯特拉罕等地多次发生工人罢工，工人要求获得与红军同样的粮食配给(按:当时参加红军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可以获得粮食配给)，这些罢工都被无情地镇压下去了。其中很多镇压令正是列宁、托洛茨基等人亲自下达的。与列宁把罢工工人骂做“坏蛋”、“流氓”相比，托洛茨基的说法更有“逻辑性”，他认为现在工人已经被组成“劳动军”，工人罢工就等于军人开小差，“应把开小差的工人关进惩罚营或送进集中营”。

1921 年 2 月 24 日，俄共(布)彼得格勒委员会决议把工人的罢工定性为“反革命破坏”，命令对罢工工厂立即实行军管，对工人们进行重新注册，在所有的机关和企业中都组成可以调动军队的特命全权“革命三人小组”，任何人都必须遵守三人小组的所有命令和决定，三人小组具有至高无上的、包括采取极端惩罚措施在内的“镇压权”，“可在每一个别情形下使用军事力量”，“如若街上有人群聚集，部队可动用武力，如有抗拒者，就地枪决”，尤其是对那些具有煽动能力的工人活动分子决不手软。



如今大家都知道“十月革命”后成立的“契卡”就是“肃反委员会”，批评它“肃反扩大化”的声音也很多了。但很少有人注意到的是，实际上这个机构的全名叫“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换句话说，它要“肃清”的对象除了政治上的反对派(“反革命”)，还包括更加漫无边界的所谓“怠工”者。“怠工”都要镇压，更何况罢工?从此之后，在沙皇时代工人可以频繁罢工的权利就再也不复存在了。1929 年苏联的劳动法典规定，工人旷工 3 天，企业就可以开除，行政部门有权不经过冲突评议委员会批准，独立地对“违反考勤规定者”进行各种处罚。我们不要望文生义地以为，“开除工人”就会使他成为失业者。不会的。1929 年的苏联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失业现象据说已经被“消灭”。乞丐与流浪汉都是给“社会主义”抹黑，“盲流”就等于“流氓”，专政的铁拳在等着他们;而做小生意、揽私活等个体谋生手段也是“资本主义”的违法行为。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开除工人”当然不仅仅是把他们撵出工厂让他们到社会上乱跑，而通常就意味着把他们送进劳改(劳教)营，在“劳动义务”的强制下服苦役。

就这样，俄共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禁止罢工的“工人阶级政党”。

当时也有些人解释说，这是因为在战争时期不得不如此。但是最高领导层很快反驳说:这些强制“绝不仅是紧急措施”，而应当是“常规”。托洛茨基甚至在全俄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公然以苏俄经济自比农奴制，他说:“根据经济计划进行社会主义劳动调控，对每个工人来说就是强制性的。这是社会主义的基础。……说强制劳动总是没有效果的，这是最可怜、最不幸的自由派的偏见，奴隶劳动同样有生产成效，农奴的强制劳动不是封建地主恶意的产物，(当时)它是一种进步现象”。“也许是现代唯一一次坦率地为强迫劳动辩护”的这番话甚至吓坏了后来的波兰托派思想家多伊彻，毕竟是外国人的多伊彻对自己崇拜的这位革命家“讲话竟非常近似于一个过去的强迫剥削制度的辩护士”而深感惊愕。的确，听到这些话的人们都会问，既然如此，那就让封建农奴制一直持续下去好了，还搞什么革命，还要什么社会主义?

正如苏联史学权威刊物《历史问题》前主编伊斯肯德洛夫所说，“新政权推行国有化政策的极其残酷的做法，国有化最终成了全面‘剥夺剥夺者’、不仅强行没收大资产者，而且强行没收中等私有主甚至小私有主的全部生产资料和全部财产，而且其中的多数人被宣布为人民的敌人并成为在自己的国家中被抛弃的人”。紧接着托洛茨基提议，由军事人民委员会承担劳动人民委员会的职能。列宁全力支持托洛茨基的主张，1919 年 12 月 27 日便由托洛茨基主持成立了劳动义务委员会。当时一些老革命坚决反对这种主张，他们不相信凭军事命令能使经济的车轮运转，不相信“用法老建造金字塔的办法可以建立计划经济”，便把托洛茨基称为“新的阿拉克切耶夫”。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11-5 李永忠，董瑛：苏共的纯洁性是怎么一步步丧失的


李永忠，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

> “苏联共产党在 93 年的建党、74 年的执政历程中，由建党之初几十人的小党发展成为近 2000 万党员的世界性大党，然而其纯洁性则呈现出重力加速度下降的现象，执政时间越长纯洁性流失越明显，越是到执政后期纯洁性流失越急剧，由一个发展上升、先锋模范、核心领导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政党演变成为隐性流失、显性流失又急剧崩溃的殇党。”

苏联共产党在 93 年的建党、74 年的执政历程中，由建党之初几十人的小党发展成为近 2000 万党员的世界性大党，然而其纯洁性则呈现出重力加速度下降的现象，执政时间越长纯洁性流失越明显，越是到执政后期纯洁性流失越急剧，由一个发展上升、先锋模范、核心领导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政党演变成为隐性流失、显性流失又急剧崩溃的殇党。这其中有一系列待解的难题、规律、特点和教训，值得世人沉思和鉴镜。

发展上升期

列宁不仅是科学社会主义实体形态的开创者，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纯洁性建设的开创者。列宁建党和执政时期，成为苏共纯洁性积累发展和显著上升期。

一是主张组织建党。1903 年，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首次提出了组织建党的原则，主张:建立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集中统一的党;凡是党员，不仅必须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而且必须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坚持地方服从中央、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原则。

二是注重质量建党。打天下时和建政期间，列宁十分重视党员队伍的质量建设。他强调:“世界上只有我们这样的执政党，即革命工人阶级的党，才不追求党员数量的增加，而注重党员质量的提高和清洗‘混进党里的人’”。

三是实行纪律固党。列宁强调，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不仅要有严密的组织，还要有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以维护和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四是依靠群众建党。列宁用古希腊关于安泰的神话来强调党群关系建设。他形象地将无产阶级政党和党的领导干部比作安泰，把人民群众比作大地母亲，并指出，我们战无不胜的力量源泉，就在扎根于人民群众中，就在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里。因此，密切联系群众是党执政的最大政治优势，脱离群众是党执政的最大危险。

正因如此，列宁领导的苏共，不仅从一个不太为人所知的地下党，迅速成为一个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号召力的革命党，进而发展成为一个经受住了血与火、生与死的多重考验、展示出先进性和纯洁性形象的执政党;不仅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能够有效地克服和纠正革命和建设中的失误和不足，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

显性提升与隐性流失并存期

斯大林执政时期，是苏共纯洁性显性提升与隐性流失并存期。在近 30 年的时间里，斯大林借助列宁的革命权威和政绩红利，依靠苏联模式的短期效应，明显提升了苏共的先进性形象，推进了苏共的纯洁性建设。

其一，列宁革命和建设巨大红利的延续效应。列宁革命和执政期间，是艰苦卓绝、出生入死的创业期，创造了苏共的辉煌成就、革命政绩和崇高威望。但不幸的是，他怀着对共产主义事业未竟的遗憾，怀着对斯大林能否十分谨慎地使用权力的忧思，过早离世，其红利则被后世、不断释放。后来执政的斯大林，充分享受和运用了列宁的革命和建设红利。

其二，卫国战争和二战的重大胜利形成的光环效应。斯大林执政时期，领导苏共成功击退了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反扑和围攻，特别是打败了德国法西斯的侵略，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性胜利。由此，不仅树立了苏共的先进性、纯洁性形象，而且在全世界树立了苏联社会主义的神圣形象，确立了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核心地位。

其三，斯大林权力结构模式的短期效应。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在斯大林时期形成的，苏联模式是以“议行监合一”和等级授职制用人体制为主要特征的。斯大林依靠这一模式，动员和集中全国资源和力量，建立了强大的国防军事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基础，建立了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了苏联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基础体系，成为当时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旗帜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

但是，斯大林执政期间，为了垄断绝对权力、打造“教主”地位，依靠不受监督制衡的无限权力，以“红色恐怖”手段，不断搞政治清洗、等级授职和造神崇拜三大运动，消灭现实和潜在的敌人与对手，消除对斯大林模式的不同看法和声音，培养在册权贵和“圣剑骑士团”，给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造成了重大的隐性损伤。

大搞清洗运动。斯大林上台执政后，采取结盟联合、分化孤立、各个击破、整体清除的方法，对持不同政见的阶层和人士进行大清洗，压制和剥夺各社会阶层和广大民众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全苏联遭到他迫害的人数达千万计，几乎每个家庭都有受害者，给广大家庭和党员干部造成的心理创伤持续几十年。

大搞等级授职运动。在清除反对派和大清洗的同时，斯大林抛弃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普选制精神和苏联宪法原则，以等级授职制和职务终身制取代普选制和任期制，设置了一套以任命制为核心的《职务名册》，其本人主要控制着《职务名册》的第 1 号和第 2 号名单，插手和操纵第 3 号名单，形成以其为核心的“管理层”控制。整个政治局成了斯大林的政治局，形成了清一色的斯大林党中央。通过排斥异己的所谓纯洁性“大清洗”，致使苏共以党代政制、一党独政制、一把手一人治制、职务终身制、指定接班人制、官僚特权制等，在苏联代代相传，甚至愈演愈烈。

大搞造神运动。为把自己打造为精神图腾和“教主”，斯大林一方面垄断意识形态，对各阶层人士和广大民众进行思想控制和言论管制，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教条主义、实用主义的解释和运用，“统一”全党思想和行动，使全党“团结一致”;另一方面大搞造神运动，树立个人崇拜，打造绝对权威，塑造其在全党全国全军中的神圣形象，教化全党全国人民对斯大林模式的遵从和固守，将其一言一行当成全党全国甚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绝对真理。

隐性流失加剧期

斯大林之后，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再到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他们执政时期的苏联，尽管综合国力、军力达到了顶峰，经济实力居世界第二，与美国分治世界近半个世纪;尽管赫鲁晓夫在联合国大会上一边脱下鞋子敲打发言桌、一边声称要埋葬帝国主义，勃列日涅夫将飞船送上天、导弹部署到美国的家门口;尽管形成和拥有改革的最佳机遇和条件，但由于他们既是斯大林模式的产物和受益者，又必然是斯大林模式的执行者和传承者。他们共同将斯大林模式推向了固化和极化的境地，不仅消耗完了斯大林模式的红利，而且隐性地损伤和流失了苏共的先进性、合法性和纯洁性，留下一个盛极而衰的苏联给戈尔巴乔夫。

赫鲁晓夫充分利用这种体制的独裁主义结构，特别是执政后期，无法摆脱绝对的权力和谄媚的腐化作用，同样搞党政合一，同样搞个人极权，同样搞个人崇拜，同样搞党内斗



争，同样搞霸权主义，重新走向斯大林式的极权道路，致使斯大林“议行监合一”的权力结构模式和等级授职制的用人体制反弹和回归，使苏共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受到了隐性损伤。

作为等级授职制复制的“武大郎”式干部的杰出代表，勃列日涅夫无能研判和把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无心融入和顺应世界新科技革命的潮流，无力担当和推进继往开来的时代变革重任，痛失苏联历史上的最佳改革时机，维稳抑变 18 年，使斯大林模式更加成熟、更加固化，走向极端，成为苏联历史上的“超稳定时代”。特别是从 1982 年到 1984 年，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苏共连续三任年老病弱的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相继在职病逝，成为苏共执政危机和纯洁性危机的隐性加剧期。

显性流失与急剧崩溃期

苏共经过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时代，丧失了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革新的最好时机，也由纯洁性的隐性流失期迅速走向显性流失与急剧崩溃期。

1985 年 3 月 11 日，在“别无其他的选择”的情况下，在苏联人民发出“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的怒吼声中，苏共挑选旧体制内“最合适”人选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但此时的苏联已到了“极度萧条衰退时期”，出现了全面危机，党和国家开始显露出“苏联之灾厄”。

加之，戈尔巴乔夫改革过程中，始终在激进派与传统派的夹缝中犹豫摇摆，始终在“议行监合一”的权力结构中折腾回复，始终在等级授职制的用人体制中选人用人，在内外交困、慌不择路的情况下，超越党内分权和党政分工两个阶段，直接搞党政分开，最后将最高权力中心由党内转移到苏维埃再到总统，自己成为拥有无限权力的超级总统和民主利己主义者。

由此，不仅激进改革派抛弃了戈尔巴乔夫，而且党内保守派也放弃了戈尔巴乔夫，最要命的是各阶层和人民群众都对戈尔巴乔夫感到极度失望，苏联已再也没有改革的时间和空间了，也无人并无能替苏联负责了。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成为苏共执政危机总爆发时期，成为苏共合法性、纯洁性显性流失乃至急剧崩溃破产时期。

苏共纯洁性丧失过程中的乱象

苏共的纯洁性不断丧失的过程，既是苏共蜕化变质、脱离群众的过程，也是苏共执政危机积累、加剧到爆发的过程。从总的发展趋势看，自斯大林时期起，苏联作为一种社会主义形态并没有朝着保障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目标迈进，不仅总体上形成和固化、甚至极化了斯大林“议行监合一”权力结构模式和等级授职制的用人体制，而且丧失了苏共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推进权力结构改革的最佳机遇和条件，苏共不断走向“四大危险”。



精神懈怠。几十年的时间里，一代又一代的苏共党人，依靠强大的意识形态教化，严格的舆论言论管制，搞教条化、垄断化、实用化的马列主义，不仅始终没有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发展马克思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等重大而根本的问题;而且道德人格物化、核心价值缺失、理想信念坍塌、话语体系阻塞，形成说谎机制和伪善氛围，形成“万马齐喑”甚至“听不到人民声音”的可怕局面，出现了严重的精神懈怠危机，从精神上和心理上不断解构苏共的纯洁性资源和执政根基。

能力不足。斯大林及其后的苏共党人，在不断扩大阶级基础的同时，忽视了党员队伍和干部队伍的质量建设，党员发展过多过快，干部队伍膨胀腐化，许多不知党、不信党、不爱党的人被吸收到党的队伍中来，入党提干功利化、手段化的现象不断加剧，严重影响了队伍的整体质量、形象和战斗力。特别是长期推行封建社会的等级授职制，形成了“武大郎式”的用人导向和干部标准，产生了大量“勃列日涅夫式”、“契尔年科式”的维稳型、执行型干部，庸人得道、奸佞当权，精英淘汰、士在游寓，整个队伍“能力不足”和“本领恐慌”问题日益突出，执政能力层层矮化、代代矮化。因而，最终无人、无能也不愿替苏联负责了。

党群疏离。由于苏共长期推行以牺牲人自由全面发展权利为代价的现代化，大搞政绩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始终未能解决广大民众的民生民权民主问题;同时，伴随着权贵阶层的发展壮大，苏共走上了腐化变质的道路，“安泰”离开了大地，党群干群日益疏离，切断了同人民群众血肉关系，苏共执政的最大政治优势变成了最大的执政危险。苏共解散前，已有 400 多万名党员退党。苏共解散、苏联解体过程中，全国近 2000 万党员、2600 万团员、2 亿工会会员和 300 万既得利益集团成员，几无一人抗议和救护。

消极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苏共各级干部非常信奉实用主义和物质主义，没有意识形态的立场，只会重复官方的意识形态词句，只关心自己的特权和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成为口号，升官发财成为公开追求，腐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权力成为一种乐趣，形成了以“一把手”为核心的各种既得利益集团和官僚腐败集团，“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苏联解体以后，那些“在册权贵”摇身一变，大都成了新国家新体制新权力结构的新成员。

保持党的纯洁性的努力

苏共在 74 年的执政过程中，自斯大林时期起，其纯洁性总体上是隐性损伤与显性流失并发，期间也有过三次挽救性改革，但要么人亡政息，要么人没亡政就息了。

列宁的晚年顶层设计努力。列宁晚年特别是病重期间，认真反思了苏联体制和模式的弊端和执政危险，清醒地认识到无产阶级执政党的政权建设不能“盲目”地、机械地“重



复”巴黎公社经验，必须借鉴和吸收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人类社会的优秀文明成果，主张推进党内权力结构改革，顶层设计了无产阶级执政党第一张“议行监三权分开”的权力结构草图，意在以此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但遗憾的是，人亡政息。斯大林及其后的一代又一代苏共党人剑走偏锋，形成和固化了一条“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的畸形权力结构和以牺牲人为代价的发展模式。

赫鲁晓夫的改革努力。赫鲁晓夫执政 11 年间，对斯大林权力结构模式和等级授职制用人体制的弊端和危害有所认知和反思。

他从思想文化“解冻”、揭批斯大林个人崇拜、平反冤假错案等入手，实施了“非斯大林化”的修补性改革。但由于其始终没有找到斯大林犯种种错误而长期得不到纠正的根本原因，始终没有顶层设计和基层试验以权力结构为核心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始终没有抓住党内特别是各级党的“一把手”“权力过分集中”这个“总病根”，只是在斯大林“议行监合一”权力结构模式的窠臼中进行技术改良、局部修补、同义反复，最终陷入人没亡政就息了的宿命。

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努力。戈尔巴乔夫执政之初，着手进行以加速战略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但立马遭到了党内保守势力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此时，他意识到陈旧腐败的政治体制是制约和阻碍苏联改革发展的关键因素。他转而进行以公开性、民主性、多元化为“新思维”的政治体制改革，然而难以形成共识，并遭到了旧体制旧模式的强大阻碍。于是，他又进行揭老底、晒旧帐、改宪法、行多党、破垄断的民主利己主义改革。虽然打破了苏共特别是党内传统派对权力长期垄断的局面，但仍然回到了“权力过分集中”和“武大郎开店”的老路上，落入斯大林权力结构模式和等级授职制的窠臼，更重要的是使本已严重受损受伤的苏共先进性、纯洁性形象和合法性、合理性地位彻底丧失，最终改革破产，亡党亡国。

鉴镜与启示

苏共纯洁性的丧失，亡党亡国的特大事故，根本原因是“议行监合三为一”的权力结构模式和“用等级授职制来代替普选制”的任命干部方式，这不仅是“苏联模式”的核心，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严重挫折的主要症结;这不仅是世界政党研究的典型案例，也是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建设的特殊遗产，还是当代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国家不得不读的必修课。以苏联解体为鉴镜，总结和转化党的纯洁性建设的经验和教训，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破解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使命。

进行以发展党内民主，保持党的生命力、纯洁性为目标的权力结构顶层设计。深度挖掘、总结和转化中国历史上权力结构和监察制度建设经验，借鉴人类社会权力结构建设的



有益成果，进行权力结构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明确“党内国会”之下“议行监分开”的等腰三角形权力结构改革目标，明确党内分权——党政分工——党政分开的权力结构改革三阶段的路线图，建立一种能够保持和发展党的生命力和纯洁性、很好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权力结构。

建立推进权力结构改革、保持党的生命力、纯洁性的基层试验区。按照邓小平关于权力结构改革的要求，借鉴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成功经验，围绕解决“权力过分集中”这一“总病根”，遵循分权制衡的原则，在全国市县党代会常任制试点以及政务公开、党务公开和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的基础上，创办县级党委权力结构改革试验区，从县级党内的分权入手，科学分解县委特别是县委书记权力，合理配置县级权力结构，点上试点、面上突破，以基层突破带动全局突围，逐步推进全党乃至全国的权力结构改革，以真正实现“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保障并促进以维护党的生命力、纯洁性为共同目标的公民社会和权利社会建设。科学合理的权力结构，有利于民主的存在和发展，有利于党的生命力、纯洁性的保障和发展，有利于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和加强。因此，权力结构的改革和转换，必须厘清权力与权利的授受、制衡和回归三大关系，最终形成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真正实现“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保障和促进公民社会和权利社会建设，构建比西方“三权分立”制度更具内涵、更具实质、更具特色的等腰三角形权力结构，永葆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政治本色。

本文来源于《人民论坛》杂志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11-6 陆南泉：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模式是怎样形成的？



陆南泉，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 **在斯大林时期，工业化是靠强迫劳动，靠利用集中营的囚犯，同时也是靠农业的破产来实现的。对农业来说，集体化实际上成了新的农奴制。**

在过去很长一个时期，作为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在苏联形成的原因都主要是从客观因素去分析，如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建立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无先例可循;当时苏联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之中，受到严重的战争势力的威胁，为此，需要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等等。无疑这些客观因素对形成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有重要影响，但实际上，形成这样的模式有其十分复杂的原因。它涉及多方面的问题，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如果只是从客观因素去研究苏联经济体制形成问题，那就难以解释苏联长期坚持这种体制的原因，也难以理解改革这种体制为何那么难。

如果对管理权限的高度集中化与管理方法高度行政化为基本特征的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的形成进行考察，就会清楚地发现这一模式的确立、巩固与发展，是由以下八个相互紧密联系的因素作用的结果。

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有关商品经济理论

生活在 19 世纪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要消除资本主义存在的基本矛盾，首先要消灭一切罪恶之源的私有制，即改变资本主义占有方式;其次，随着私有制的消灭，在未来社会商品生产也应消除，价值关系必将消失。这样，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是自觉调节的，即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有计划的、没有商品生产的与自治的社会。从而，社会可以十分简单地直接计划生产与计划分配。

这就是计划经济理论的渊源。在这种产品经济观支配下，就出现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可以立即全面实现“一个国家=一个工厂”的设想，整个社会的生产与分配可以按照预先经过深思熟虑的计划来进行。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未亲眼看到社会主义社会，他们提出的有关未来社会的设想只是一种预测，在考察商品货币关系问题时往往带有一般的推论性质。我们也不能要求他们在不具备解决这些问题的材料时做出明确无误的理论结论。

从思想理论上讲，列宁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前一直赞成马克思、恩格斯有关社会主义社会是没有商品生产的观点。但列宁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在商品等问题上的看法有了很大的变化，开始认为新经济政策就是要充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而斯大林在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到 30 年代，不从俄国实际情况出发，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以此理论为基础，一步一步地建立起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之所以这样做，也是为其在这一时期推行的经济政策服务。

为了保证超高速工业化需要的财力、物力与人力资源，斯大林认为，必须利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达到控制经济的目的。不能通过市场，而是要通过集中分配的办法来实现对整个经济的控制。

其次，在很大程度上，农业全盘集体化是合乎超高速工业化逻辑的产物，是从农村榨取资金与粮食的重要办法。如果在这个时期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应该按照商品交换原则运行经济，重视市场的作用，那么，也就不允许对农庄这样的集体经济下达几百个指令性指标，更不允许工农业产品存在十分严重的剪刀差，就得承认价值规律的作用，并大幅度调高农产品收购价格。这样国家就难以从农村获得大量的粮食与资金，也就无法保证工业化的超高速发展。

另外，强化计划原则与权力斗争是实现政治集权的保证。列宁逝世后，联共(布)党内展开的种种斗争，往往与权力之争密切相关。斯大林通过党内斗争，把各个反对派逐一击破，在这过程中把权力日益集中在自己手里。在政治权力集中的同时，他必须牢牢地控制经济，其最重要的途径就是建立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

延续军事共产主义政策

在国内战争期间，列宁提出了“一切为了前线”的口号，把整个经济转向军事轨道，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并在苏维埃俄国形成了军事共产主义的经济体制。这个体制对后来的苏联乃至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构建经济体制与认识社会主义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经济体制模式的主要特点有:除了农业外，几乎对全部经济 (包括对超过 5 人的小企业)实行国有化，以此来达到最大限度的扩大国有制企业;对农民，通过余粮征集制征收全部农业剩余产品;从生产到分配全部经济活动，其决策与管理权都集中在国家手里，实行强制的行政方法进行管理;在消灭商品、货币的条件下，经济关系实物化;国有企业与国家(总管理局)的关系是一种行政隶属关系，各企业从国家那里获得全部物资供

应，而企业生产的全部产品上缴国家，是完全的“统收统支制”;分配上实行高度的平均主义;实行劳动力的强制分配和普遍劳动义务制;当时很不发达对外经济也完全由国家控制。

很明显，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采取的一系列经济政策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被迫采取的特殊政策。列宁一再指出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不少政策超过了限度，多次加以批判性的总结，并指出，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在军事上战胜了敌人，但在经济上没有取得成功。在执行政策过程中犯了错误:“我们没有掌握好分寸，也不知道如何把握分寸。”(《列宁全集》第四十一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56 页)但俄(共)领导层和一般党员干部中仍然有不少人把这个时期实行的高度集中的、用行政命令的、排斥商品货币关系的经济体制视为长期有效的，这也是后来以斯大林为首的新领导层下决心取消新经济政策，向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回归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过早抛开新经济政策

为实现由军事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过渡，俄共(布)十大通过的决议中有一些重大经济政策:首先是取消余粮征集制，改行粮食税;实行商品自由贸易;在农村允许农民出租土地和雇工，在城市允许私人占有中小企业，把原来收归国有的小企业归还私人，还允许私人开办不超过 20 人的工厂;在工矿企业，实行经济核算制，发挥经济杠杆的作用;以租让形式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即允许外国资本在苏维埃俄国开办工厂和开采自然资源;进行货币改革，同时消灭预算赤字。

可以说，列宁从 1921 年提出新经济政策到 1924 年逝世这段时间，他的全部精力几乎都在研究如何有效地实施这些政策。但由于列宁过早逝世，没来得及在对新经济政策头几年实施的情况进行总结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与发展，使其系统化。他也没来得及去解决新经济政策与当时布尔什维克党及其他一些领导人在社会主义观念上及未来经济体制模式设想方面存在的矛盾乃至冲突。列宁逝世后，随着新经济政策的推行，俄共(布)党内领导层的分歧与斗争日趋尖锐。1929 年斯大林在击败布哈林之后，就全面停止了新经济政策。

随着新经济政策的中止，布哈林等人竭力维护的列宁提出的一系列正确主张已被最后否定。按照新经济政策建设社会主义，建立经济体制的可能性已被排除。斯大林的主张逐步成了党的指导思想，这也标志着斯大林的经济体制模式初步确立。

斯大林在结束新经济政策的同时，大胆地提出了自己发展社会主义的一套“左”倾路线。他提出的“大转变”有着深刻的含义，涉及各个领域，包括经济、政治、意识形态领域，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大转变”，为建立斯大林体制模式开辟了道路。也正是在这个时期，苏联社会主义开始变形。



超高速工业化加速经济集中

从实际情况看，苏联工业化作为一个运动的全面开展始于 1928 年，即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共 13 年左右。

斯大林工业化方针的最主要特点是:强调高速度是工业化的灵魂;集中一切力量片面发展重工业;用高积累与剥夺农民的办法保证工业化所需的资金。据估计，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从农民吸收的资金占用于发展工业化所需资金的 1/3 以上。

苏联工业化时期工业管理体制的主要变化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形成指令性计划制度，这是苏联整个经济体制的一个基本内容。

其次，不论部还是总管理局作为国家行政组织，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直接管理与指挥，都是通过行政方法实现的。

第三，与上述特点相关，企业实际上是上级行政机关的附属品或派出单位。

第四，形成部门管理原则，这有利于中央对分布在全国各地企业实行集中领导。

第五，由于工业管理体制的上述变化，使得工业化时期力图实行扩大企业权力和加强经济核算的目的实际上都落空了。企业在人、财、物方面基本上没有决定权的情况下，经济核算只能徒具形式。

第六，工业企业管理一长制得以实际的执行。工业化时期斯大林推行的一长制，并没有建立在经济民主管理基础上，企业厂长独揽大权，成了企业真正的官僚独裁者和斯大林模式基层的组织基础。

第七，在工业化时期，企业国有化迅速发展。

工业化运动对斯大林体制模式形成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如果说，1929 年全面中止新经济政策和斯大林思想开始占主导地位标志着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得以初步确立，那么，斯大林工业化方针的全面贯彻，标志着不只是斯大林工业管理体制、经济体制模式全面建立和已扎了根，还标志着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已全面建立并扎了根。

在工业化运动期间，斯大林在苏联创造了“世界上所有一切工业中最大最集中的工业”，而且是“按照计划领导”的“统一的工业经济”。

农业全盘集体化成了新的“农奴制”

从斯大林根本改变对农民的看法为起点，随之而来的就是根本改变农民的政策，推行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其结果不仅仅是把占人口最多的农民与国民经济中居重要地位的农



业纳入了斯大林统治经济体制之中，而且意味着在苏联在朝斯大林整个社会主义模式迈进。

斯大林用强制乃至暴力的办法加速农业集体化的主要目的有:控制粮食与取得资金;全面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消灭“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的个体农民。斯大林对此解释说:“为什么把个体农民看作是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呢?因为在构成我国社会的两个基本阶级中，农民是一个以私有制和小商品生产为经济基础的阶级。因为农民当他还是从事小商品生产的个体农民的时候，经常不断地从自己中间分泌出而且不能不分泌出资本家来。”(《斯大林全集》第十二卷，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37 页)就这样，把在苏联社会中人口众多的农民当作“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消灭了。”这样就在国内消灭了资本主义复辟的最后根源，最后形成了完整的斯大林经济体制。农业集体化完成过程中，苏联也逐步建立起高度集中的农业管理体制，并成为斯大林经济体制中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苏联在农业集体化过程中形成的农庄计划体制具有以下特点:一是计划的指令性，即国家下达的指标，集体农庄必须执行;二是指标繁多;三是完全忽视集体农庄是集体经济的特点，实质上实行的是与国营企业同样的计划制度;四是从农业集体化时期开始一直到斯大林逝世前，国家在规定集体农庄生产计划制度时，都以有利于国家控制粮食为基本出发点和原则的。

斯大林宣传说，他的农业集体化是列宁合作社计划的继承和发展，实际上与列宁的晚年思想有着重大原则区别。列宁主张“在农民中进行文化工作”，使他们认识到合作社的好处，强调自愿原则，认为完成这项任务需要几代人的努力。1922 年 11 月底副财政人民委员弗拉基米罗夫到列宁那里做客，在交谈中列宁说了以下一段被弗拉基米罗夫叫做“赠言”的话:“我们现在有两个最重要的领域。第一个是商业，这就是学会经商，为的是首先同农村，农民结合。不这样做有一天农民会让我们去见他妈的鬼的。老实讲，农民并不理会谁，什么样的领导坐在城里，谁在克里姆林宫统治。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从城市得到什么，克里姆林宫给他们什么。他们会使用这样的试金石:同沙皇时期相比，他们生活变得好一些，还是变坏了。如果看到用自己的产品换来比过去多的印花布、砂糖、鞋子、器皿、农具，如果还看到赋税减少了，在农村再也看不到他们痛恨的警察和警察局长了，庄稼汉对新制度就会感到完全满意。而如果不满意，对付数以百万计的农民是困难的，不可能的。喀琅施塔得起义、安东诺夫运动、坦波夫以及其他省份的叛乱，都是对我们的严重警告。应当采取一切措施，以便生活在长期的和平之中，同中农友好相处。”

粮食征收制几乎征走了农民的所有粮食，使农民难以生存，导致在内战后期终于揭竿而起，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



说“揭竿而起”不是比喻，而是真实的历史。那时就有一宗起义叫做“叉子暴动”，农民没有武器就把叉子当做战斗的武器，可以说是“揭叉而起”。农民高呼“打倒康姆尼”，“康姆尼”是共产的意思，可以理解为“打倒公社”，也可以理解为“打倒共产主义”，反正农民不要你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了。那时官方把农民暴动叫做“盗匪活动”，但这并不改变农民反抗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实质。

列宁承认，那时农民暴动遍及全国各个省份。最后爆发喀琅施塔得兵变。喀琅施塔得本来是革命的堡垒，十月武装起义时著名的阿芙乐尔巡洋舰就是从喀琅施塔得军港开过来的。喀琅施塔得的水兵是一支富有战斗力的突击力量，在革命和内战中哪儿有困难，就派水兵去支援，如今连这后院也举行暴动，而其纲领并不反对革命，而仅仅反对布尔什维克的错误政策。这些反布尔什维克的暴动汇集成一股强大的激流，使布尔什维克政权遭遇到革命胜利以来最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参见郑异凡:《列宁在 1922 年的赠言》，(《同舟共进》2013 年第 2 期)戈尔巴乔夫在下台后出版的著作中指出:“在斯大林时期，工业化是靠强迫劳动，靠利用集中营的囚犯，同时也是靠农业的破产来实现的。对农业来说，集体化实际上成了新的农奴制。”([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著，徐葵等译:《对过去与未来的思考》，新华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5—36 页)

“大清洗”结束夺权

斯大林模式的形成过程也是与围绕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方针与政策所展开的政治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过程，也就是说，它是在苏联特殊历史条件下在复杂斗争过程中形成的。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清洗”运动，与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运动一起，称之为三大运动。“大清洗”运动不仅是实现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的重要政治保证的手段，也是最终形成斯大林模式的不可分割的重要因素。

斯大林的“大清洗”涉及各个阶层的人，既包括原反对派领导人及其成员，也包括苏联党、政、军的高层领导人与广大干部队伍与人民群众。不论是“大清洗”的规模还是手段之残酷，都可以说是苏联历史上最可怕的悲剧。

“大清洗”运动结束了夺权过程。由于大规模的镇压，集中制发展到了专制主义，使全党全国服从于斯大林一个人的意志，按照他的思想在苏联建设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

历史传统的潜移默化

要对苏联十月革命之后出现的种种重大问题有深刻理解，就必须把这些问题的研究与十月革命前俄国在漫长的发展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传统联系起来考察，特别是在分析斯大林模式形成原因的问题时，显得尤为重要。



革命前的俄国曾是一个长期集权统治的国家。在十月革命前，俄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还带有浓厚的封建关系。这就是说，俄国虽已进入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但在经济与政治方面仍保留着浓厚的封建传统的特点。俄国的资本主义在相当的程度上是在封建主义体制中运行的。正如列宁所说的:俄国的“现代资本帝国主义可以说是被前资本主义关系的密网紧紧缠绕着”。(《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44 页)在这种政治经济条件下，沙皇长期实行的是专制制度，国家最高权力在沙皇一人手中。斯大林所继承的俄国历史传统，最主要是沙皇的集权与扩张。当然，这种扩张是以世界革命名义的扩张。而所有这些都要求有一个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依靠它来建立军事经济或战备经济，并把经济权集中在少数人乃至斯大林一个人手里，成为其推行各种政策的财政经济基础。

斯大林的个人品性

斯大林作为苏联最高领导人，执政长达 30 年，因此，斯大林个人品性对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形成的影响是不能不考虑的。详细摘录斯大林传记中有关对他描述的材料，在这里是不必要的。笔者只想根据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的实践，来考察他个人对经济体制模式形成产生的影响。

不少学者认为，坚毅、刚强和政治敏感反映了斯大林个人品性的一个方面，而粗暴任性、强烈的权力欲、冷酷无情、崇尚暴力、主观片面、妒贤忌能和孤僻，是反映斯大林个人品性的另一个方面。斯大林是苏联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也是十分复杂的人物，因此，他的个人品性对体制模式形成所产生的影响也表现在很多方面。

斯大林的粗暴使他容易犯滥用权力、破坏法制等错误，从而使政治体制中的这一弊端不断发展。斯大林的强烈权力欲，使得他不惜一切地破坏民主集中制原则，独断专行，排除不同观点的人，甚至从肉体上加以消灭。斯大林在工作中不需要顾问，只需要执行者。他要求下属对他完全服从、听话、百依百顺、完全遵守奴隶般的纪律。他不喜欢那些有自己见解的人，他用特有的粗暴把这样的人推开。

斯大林的独断专行，不仅表现在领导工作方面，在对很多学科的命运问题上，也毫不犹豫地扮演了最高仲裁者的角色。对待遗传学是这样，对待语言学是这样，对待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这样。还要指出的是，斯大林对不同意他观点的学者，不只是极不尊重，还加以粗暴的污辱和嘲弄。譬如，对经济学家雅罗申柯对政治经济学家教科书提出的意见，斯大林说他“是在跟着布哈林的尾巴跑”(《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594 页)，是发了疯的马克思主义者。当雅罗申柯请求委托他编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问题时，斯大林说，这个请求“不能认为是严肃的，至少是因为他这种请求充满着赫列斯塔科夫的气味”。



斯大林的主观片面导致产生了一系列错误的有关社会主义理论，如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进展阶级斗争更加尖锐的理论，把阶级斗争视为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排斥商品货币关系……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观对道路和体制模式的选择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斯大林崇尚暴力和冷酷无情导致大规模的镇压。1934 年 7 月，斯大林与英国作家威尔斯谈话时说:“一种社会制度被另一种社会制度所代替的过程，在共产党人看来，并不简单的是自发的和平的过程。而是复杂的、长期的和暴力的过程。”(《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361 页)“大清洗”运动中，滥杀那么多无辜，对斯大林来说，并不构成什么道德问题。他从不检讨自己，从不后悔，他考虑的只是为了不间断的“革命”和扩大自己的权力而拼命向前，不惜用火和剑粉碎任何反抗，哪怕是最轻微的反抗——即使来自最亲密的战友。后来，实践向人们表明，斯大林逐步对强制与暴力当作偶像加以崇拜。在斯大林看来，革命、所有制的改造、工业化、农业集体化、文化管理等等，都是强制暴力的同义语。现在回过头来看，斯大林之所以在很多场合下赞赏伊凡四世、彼得一世、叶卡捷琳娜二世是“伟大而英明的统治者”，也就不奇怪了。斯大林甚至还认为，伊凡四世专权和残酷得还不够，伊凡雷帝在处死人之后总是后悔和忏悔个没完，这表现得不果断，说彼得一世“对外国人过分纵容”，国门开得过大，听任外来影响向国内渗透。

斯大林妒贤忌能也是他个人品性中的不可忽视的一个弱点。他一方面把与他同代的革命领导人通过各种手段排挤出去，垄断了对列宁主义的解释权，另一方面他竭力压制知识分子，特别是党内知识分子。斯大林的文化素质不高，没有受过系统教育，不懂外文，而在他的周围有不少智慧非凡和具有突出才能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这样的环境里，斯大林有着无止境的想领导一切的欲求，却是才能有限，因此不能不感到自己作为政治活动家、理论家和演说家都有许多不足之处。正是这一点促成了他的嫉妒心以及对任何真正有教养的党内知识分子心怀仇恨。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人成为斯大林敌人并不是因为他们反对苏维埃政权，反对党和反对斯大林，而是因为按对革命贡献来说完全可以与斯大林平起平坐，甚至比斯大林有更大贡献。(参见[苏]罗・亚・麦德维杰夫著，赵洵等译:《让历史来审判》，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532-533 页)在苏联国内再版 300 多次，译成 31 个国家的文字，在世界共发行了约 4.7 亿册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也反映出斯大林个人的品性。这部书的主要观点无疑是属于斯大林的。该书的特点是:伪造历史、教条主义、公式化和民族主义(在不少情况下变成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这方面的情况很多人熟知的，不需要进一步论述。但要指出的是，在苏联历史科学中经常出现为沙皇的许多侵略战争辩解，不能不说与斯大林的影响有关，并在斯大林的对外政策中不时地有所反映。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11-7 景凯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景凯旋，南京大学教授。

“

一幅工人画像需要精确的真实，还是艺术家的笔触所表现的真实；一首无韵诗可以表现积极的社会主义内容，还是社会主义诗人需要遵循某种形式，这类问题不取决于批评家和艺术家，而是取决于文化官员。他们的决定往往出于政治原因和个人爱好。

”

苏联统治东欧国家后，大力推行苏维埃文化。1949 年 3 月，苏联外交部出台一系列针对东欧各国文化的建议，认为东欧国家知识分子仍受西方资产阶级影响，需加强意识形态工作，这包括翻译和传播苏联电影和书籍，建立苏联文化中心和苏联式学校。苏联文化官员不仅要传播苏联艺术，而且想从根本上改变东欧各国文化。

苏维埃文化的范式便是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东德成立之初，苏联占领军文化官员便公开批评前卫艺术家们“试图装作革命者”，其艺术是“毫无内容的形式”。许多东德艺术家所喜爱的毕加索的绘画，更被指斥为颓废、堕落。这引起艺术家困惑，他们没想到“进步”的苏联居然在艺术上赞成保守。实际上，由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强调艺术的社会责任，反对为艺术而艺术，苏联在上世纪 30 年代就禁绝了实验诗歌和前卫建筑艺术。

谴责艺术家们创作抽象艺术、无调性音乐和实验诗歌很容易，他们可以去创作“工业化养猪场的合理化和机械化”之类主题。但一幅工人画像需要精确的真实，还是艺术家的笔触所表现的真实;一首歌的抒情是“进步”的，它与音调的难度有没有关系;一首无韵诗可以表现积极的社会主义内容，还是社会主义诗人需要遵循某种形式，这类问题就不取决于批评家和艺术家，而是取决于文化官员。他们的决定往往出于政治原因和个人爱好。

斯大林时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控制艺术家的工具，连布莱希特的作品也未能幸免。他作词的歌剧《卢克勒斯》就因为充满不和谐音和机械敲打的噪声，被冠以形式主义罪名。官方既不喜欢歌剧里只有九种打击乐器，没有小提琴，也不喜欢其中的反战调子(当时正是朝鲜战争时期)。布莱希特不得不给当时的东德总统威廉·匹克写信，承诺在歌剧里

加进三首咏叹调，以表现“积极的内容”。布莱希特明白了，不是艺术家而是党才具有最终决定权。

另一位艺术家斯汤培尔没这么好的运气。他在地铁站画了一幅大型抽象壁画。起初，这幅画被誉为“一首歌颂重建的多姿多彩的交响乐”，但在苏联文化官员谴责形式主义艺术后，由于斯汤培尔公开表示反对，壁画被官方宣判为“毫无意义的产品”，最终被刷上油漆，永远销毁。

建筑艺术同样需要遵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波兰华沙在战争中遭受巨大破坏，城市变成废墟。面对战后重建，有人主张完全建一个钢铁和玻璃的现代城市，有人主张混凝土街道和高楼按照野兽派艺术风格重建，而公众则希望恢复旧城风貌，尤其是恢复中世纪、巴洛克时期、文艺复兴和 18 世纪的建筑，以免民族的建筑遗产消逝。

到 1949 年，官方认为这都不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不符合波兰政府对环境决定论的信仰:如果环境可以影响人，建筑家们就有责任帮助创造新现实，新华沙不能恢复战前反映资产阶级个人品味的大杂烩布局，必须具有社会主义国家首都的风貌。这种情况下，官方重建华沙的蓝图基本上来自莫斯科，波兰国家出版社甚至还出版了一部名为《苏联建筑》的书，赞美苏联建筑艺术的成就。

莫斯科的办公楼、公共场所和街区体现出巨大、笨重和豪华，街道宽阔而很难通过，广场宽平而适合游行。但莫斯科的设计并不适合华沙，这座城市从前是为马匹和行人设计，广场和公园是用于闲暇而不是游行，地上铺的是草而不是水泥。但此时的土地已经全部属于国有，建筑家们全是政府雇员。重建华沙的设计成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样板:农业部大楼两层高的圆柱、为“五一”游行设计的大街、水泥灯杆和阳台，没有一个源自波兰的建筑传统。

波兰建筑学家戈尔扎姆曾是英国艺术与工艺美术运动的拥趸，后成为新政权的拥护者。他在论运动领袖莫里斯的书中认为，建筑可以“在内容上是社会主义的，在形式上是民族的”。体现这一思想的著名建筑便是华沙科学文化宫。宫殿位于市中心，俯瞰华沙城。这是斯大林送给波兰人的礼物——按照斯大林的旨意，要建“一个从城市任何点都能看到的宫殿”。文化宫的设计、材料和工人都来自苏联，同时吸收了波兰巴洛克时期的风格。从远处看，就像莫斯科那些婚礼蛋糕式的高层建筑，与周围显得很不协调。

华沙的重建在美学上是失败的，在经济上是浪费的。那些支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波兰艺术家们很快就被人们忘记。他们证明了艺术家与政府合作是可能的，却没有证明这种合作是成功的。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论】

11-8 陆南泉、沈志华等：谁抛弃了前苏联？



陆南泉，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 “
> **可以说，是人民抛弃了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是人民抛弃了前苏联共产党，因为这个党已经不再代表人民利益。**
> ”

对于前苏联解体的原因和教训，俄罗斯的主流意识已不再也不需要关心。在中国，研究前苏联的重心还是如何吸取前苏联的教训，探究前苏联社会主义失败、国家解体的原因

2011 年底，世界的目光再次投向俄罗斯，不仅仅因为那里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对普京的示威游行，也因为整整 20 年前，那里发生了 20 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苏联解体。

1991 年 12 月 25 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总统职务，次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宣言，宣布苏联不复存在。20 年过去了，人们至今仍然充满了疑问与困惑：拥有 1800 万党员的前苏联共产党领导了 74 年的国家，为什么突然间就轰然倒塌？

中国曾经长期将前苏联作为学习的样板，因此前苏联解体在中国引起了巨大反响。在当年，中国的最高领导层曾召开了十个半天的座谈会，讨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前苏联东欧为什么发生剧变”？虽然没有结论，但是前苏联解体无疑对中国改革的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

迄今为止，中国各界对于前苏联解体的原因说法不一，争论激烈。前苏联如同一面镜子，不同的解说折射出中国各界对世界形势和改革前途的不同认识。

前苏联解体 20 周年前夕，《财经》记者采访了三位资深的前苏联问题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陆南泉先生、原红旗杂志社副总编辑黄苇町先生和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史研究中心主任沈志华教授，他们从多方面剖析前苏联解体的制度根源。

接受采访的三位学者观点不尽相同，但是他们都认为，只有正视前苏联垮台原因，坚守改革底线，才能避免重蹈覆辙。



从历史上看，前苏联没有逃脱“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循环，“如果人们不能从中真正地吸取教训，那么历史悲剧就不能以历史的进步来补偿。”

前苏联 “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

《财经》：前苏联解体是 20 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在 1991 年以前，前苏联虽然有各种困难，但仍然是与美国比肩的超级大国，没有任何人能够想到，一个超级大国竟然会在几乎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突然解体。这究竟是为什么？

陆南泉：东欧开始发生剧变的时候，不少人认为，苏共是列宁创造的党，基础比较牢固，不至于发生剧变，但很快前苏联也发生剧变。这时候很多人认为这是西方“和平演变”的结果。

可是，用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来说明前苏联发生剧变的根本原因，从理论上站不住脚，也不符合马克思唯物主义，于是人们就开始从民族问题、体制问题、经济问题、对外霸权、外交政策等各个角度来研究前苏联东欧剧变的内在原因。

学界共识是，前苏联剧变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即是一种“合力”的结果。但前苏联剧变的根本性的、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从 1996 年开始，学界一直在寻找和思考。

沈志华：至今仍然有人把前苏联剧变的原因主要归咎于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称他们搞的修正主义和非斯大林化导致了前苏联的解体。

这种说法严重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恩格斯在总结 1848 年革命失败的教训时指出，需要研究革命必然爆发又必然失败的原因，“这些原因不应该从一些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动荡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

恩格斯还特别批驳了领袖“出卖”论，他说：“当你问到反革命成功的原因时，你却听到一种现成的回答：因为这个先生或那个公民‘出卖了’人民。

从具体情况来看，这种回答也许正确，也许错误，但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甚至不能说明‘人民’怎么会让别人出卖自己，而如果一个政党的全部本钱只是知道某某公民不可靠这一件事，那么它的前途就太可悲了。”

黄苇町：我认为，斯大林时期就种下了前苏联垮台的恶果。斯大林统治下的前苏联权力高度集中，缺乏制约监督，缺乏党的民主和人民民主。

赫鲁晓夫既是斯大林的掘墓人，但本质上他仍然是斯大林模式的守墓人，并没有突破权力高度集中的斯大林模式。因为他把问题错误地归结于斯大林的个人品质，这不是个人品质问题，是体制造成的。



革命时期需要权力高度集中，但是夺取政权之后，革命党要转变为执政党，可是前苏联仍然延续原来的体制，党内没有民主，人民民主更谈不上。前苏联的选举都是走形式，各级官员都是上面指定的，甚至农庄主席也都是上边任命的。虽然前苏联有 1800 万“人民监察员”，都是虚的，老百姓被愚弄，没有什么权利和自由。

《财经》：那么，前苏联解体的根本性原因是什么？

沈志华：对于前苏联的瓦解，执政党负有重要责任。

前苏联共产党与西方的政党不同，西方发达国家都是先立国、制宪，后建党，政党是相对稳定的群体利益的代表，其执政与失政是平常之事，并不会对国家和社会造成震动。

苏共则不同，它作为无产阶级的政党承担着改变旧制度、建设新社会的历史使命。苏共通过十月革命夺取政权后逐渐排除了其他政党，成了前苏联唯一的政党。

由于没有人民和社会的监督、制约，苏共作为执政党，逐渐脱离了人民群众，思想僵化，特权泛滥，盛行个人崇拜；在国家发展战略上也只重强国，不知富民。

苏共创建了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这种体制和制度又导致上述弊端长期存在和发展。苏共的根本问题是没有解决领导国家的方式问题，长期党政不分、党国不分。

黄苇町：我把前苏联解体的原因总结为四条：第一，缺乏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第二，前苏联的社会主义不是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而是以人为代价的社会主义。老百姓的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现实与空洞的口号形成巨大反差，必然导致民心丧失；第三，前苏联的意识形态僵化守旧，脱离实际。因为害怕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采取“铁幕”政策，严禁公民出国。封闭、保守造成前苏联落后，也导致其意识形态弱不禁风，没有免疫力；第四，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没有社会公正。某种程度上，前苏联解体是既得利益集团的一种自我政变。前苏联解体后的权贵绝大部分都是前苏共高官，前苏联解体后使自己的利益合法化了。

陆南泉：根本原因在于斯大林模式长期未进行根本性改革。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在政治与经济体制方面的弊端，带有制度性与根本性的特点。由于没有对斯大林模式进行根本性的改革，这种社会主义制度已走不下去了，已走入死胡同。

正如普京所说：“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社会昌盛，人民自由。用意识形态的方式搞经济导致我国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无论承认这一点有多么痛苦，但是我们将近 70 年都在一条死胡同里发展，这条道路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



“是人民抛弃了前苏联共产党”

《财经》：为什么在 70 余年的历史中，前苏联一直“在一条死胡同里发展”，而不进行改革？

黄苇町：前苏联有过多次改革机遇。最早是列宁实行“新经济政策”，本来要搞 25 年，列宁死后 5 年，前苏联就重新回到了单一公有制和全面集体化。这是斯大林的“功劳”。

“二战”结束以后，也有一次改革机遇，结果被斯大林葬送了，要求改革的官员有的被撤职，有的被处决。到 1953 年斯大林逝世的时候，前苏联的农业还没有恢复到 1913 年的水平，人均工资的购买力也低于 40 年前。

赫鲁晓夫上台后也进行改革，因为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最后被赶下台，第三次改革也中止了。

接着上台的勃列日涅夫也有部分改革，主要是总理柯西金进行国有企业改革，通过利益刺激提高个人积极性。然而，改革始终在计划经济体制内进行，不敢突破。1968 年发生“布拉格之春”事件，前苏联出动坦克镇压，国内改革也随之停止。

陆南泉：尤其是勃列日涅夫时期，僵化保守的思想占统治地位，不仅经济改革半途而废，而且政治改革出现倒退，在很多方面“悄悄地重新斯大林化”。勃列日涅夫执政的 18 年积累了大量问题，耗费了大量的国家资源，是前苏联走向衰亡的一个关键性的历史时期，为后来的垮台准备了条件，到戈尔巴乔夫时已经回天乏力了。

沈志华：历史上出现的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是不完善的，如果这种制度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而不断调整（或曰“改革”），那么它就是有生命力的，反之则必然灭亡。自人类社会进入近代以来，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是历史上出现的最有影响的两种社会制度，它们的出现都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资本主义制度因其不断地进行自我调整，所以一直存在至今，这种制度不是完美无缺的，但确实是适应历史潮流的。

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其存在的几十年中，却没有能够进行调整，反而日益僵化，最后走入死胡同，到戈尔巴乔夫时代，已经无法调整，只有死亡。

那么，为什么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无法进行自我调整和改革？我研究的初步结论是：前苏联共产党是为了夺取政权而组建的，这就是它与现代国家中一切为了选举上台执政的政党的最大区别。

所以，前苏联共产党核心的问题是保卫政权，一切可能威胁到政权生存的变动（调整）都是无法接受的。这就是前苏联三次改革失败或错过良机的最根本的原因。

《财经》：前苏联共产党拥有近 2000 万党员，在丢掉执政地位之时，既没有任何地区的共产党员有组织地集合起来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也没有人民群众为支持、声援苏共而采取任何有组织的行动。这种现象很令人费解。

黄苇町：前苏联共产党各级官员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各级官员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

当时有一个调查，80％的人认为苏共既不代表人民，也不代表前苏联人民，只代表苏共官员！这意味着前苏联被既得利益集团所绑架，改革进行不下去，执政党失去了人民的认同，前苏联垮台也就变成了现实。

沈志华：前苏共的问题就像现任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所总结的，在长期一党专政的制度下，苏共实行了“三垄断”：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制度，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垄断资源与经济利益的经济制度。

在思想文化领域，它进行专制，稍有不同于官方的意见就会被认为是异端邪说，相关人士被整肃镇压，或投入监狱，或关进疯人院，或驱逐出国、剥夺公民权利。

在政治上，它垄断了权力，前苏共及其领导人的权力凌驾于政府和法律之上，出现了一个脱离人民的官僚特权阶级。

在经济上，它垄断了资源和经济利益，使得社会经济生活缺乏活力，大量资源被用于军事工业，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对苏共的不满日益增加。人民对于既得利益集团腐败专制的不满日积月累，执政地位必然丧失。

陆南泉：在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之上，执政的前苏联共产党蜕变成为一个高度集权、缺乏民主与有效监督机制、领导干部思想僵化、脱离群众、破坏法制、个人迷信和特权盛行的政党。

斯大林模式保证上述弊端的长期存在并发展，反过来，这个政党又维护了斯大林模式，使得各种改革努力都以失败告终，广大党员与人民对苏共以及由其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也逐渐失去了信任。

因此当斯大林模式被抛弃时，必然也抛弃了由这种制度模式保证其生存的苏共。可以说，是人民抛弃了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是人民抛弃了前苏联共产党，因为这个党已经不再代表人民利益。



前苏联教训："最重要的是坚持改革"

《财经》：中国曾经长期将前苏联作为学习的样板，因此前苏联的剧变在中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引发了国内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思考。中国应该从前苏联解体中吸取什么样的历史教训？

沈志华：历史已经证明，斯大林模式不能顺应人类社会发展的潮流。前苏联的剧变也表明，按照少数人的意志，用政权和国家机器的力量去搞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的根基不可能牢靠，这样的发展模式也没有可持续性。前苏联经济发展速度逐年下滑，进而发展成危机和负增长，是前苏联模式发展的必然结果。

对于前苏联解体的原因和教训，俄罗斯的主流意识已不再也不需要关心。俄国关心的是如何进一步"去斯大林化"，进一步消除前苏联时期遗留的问题，如经济结构不合理、腐败、官僚主义等。在中国，研究前苏联的重心还是如何吸取苏共的教训，探究前苏联社会主义失败、前苏联国家解体的原因，这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至关重要。

陆南泉：中国从前苏联剧变中可以吸取多方面教训。但从当今情况看，最为重要的是坚持改革。中国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不断地"去前苏联化"，摆脱斯大林模式，才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黄苇町：在改革初期，中国的主要阻力是观念，现在一些既得利益者已经成为中国改革的阻力。这些人的特点是：既不喜欢计划经济，也不喜欢市场经济，因为计划经济下不能把占有的资源变现，市场经济下权力不能过多地介入微观经济活动。

这些既得利益者就是想维持行政权力能够长期干预微观经济活动的现状。如此既能利用权力占有资源，又能利用市场变现，这其实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亵渎。

随着国际经济形势发生变化，中国的市场改革在很多方面是倒退的。就像人们所说的，"看不见的手越来越看不见，看得见的手越来越闲不住。"这样发展下去，中国就会陷入"权贵资本主义"的泥潭而不能自拔。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国这一套基本上是照搬前苏联来的，在前苏联就不成功，更别说在中国。因为没有很好的制度，最后导致了很多的悲剧。邓小平讲得很好，现在对于前苏联的认识，至少不能从改革开放初期的认识和"南方讲话"再退回去。

《财经》：俄罗斯已经抛弃了斯大林模式，可是为什么中国有些人仍然在为斯大林模式辩护，这种现象值得思考和警惕。

陆南泉：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因为一些人认为中国只有走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的老路才有前途。在他们看来，中国在改革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就是偏离前苏联模式的结果。

中国的改革过程中确实出现了垄断、贫富差距拉大、腐败等问题，这不是因为改革改错了，也不是改革过了头，而是由于改革没有到位，所以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这些问题，决不能走“回头路”，再回到斯大林模式。

前苏联正是由不断痛失多次改革机遇，特别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出现了倒退。从而成为停滞时期，成为前苏联走向衰亡时期。这个惨痛教训值得吸取。为此，必须牢记邓小平关于“不改革只能是死路一条”的著名论断。所以我认为，对照前苏联剧变，中国应吸取的最重要教训就是坚持改革，特别要深化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改革。

黄苇町：中国的许多问题至今和斯大林模式有联系。因为新中国的社会制度最初就是照搬前苏联那一套建立起来的，虽然现在改革了许多，但是仍然有许多前苏联模式的残余。研究前苏联解体，可以为中国更好地发展提供借鉴。

中国要客观、科学地揭示苏共垮台的原因，吸取前苏联垮台的历史教训，积极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冲破既得利益的阻力，深化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方面的体制改革，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才能为建成全面小康社会铺平道路。

如果中国不能从中真正地吸取教训，那么历史悲剧就不能以历史的进步来补偿。

沈志华：中国曾经照抄照搬前苏联模式，重复犯了前苏联的错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改革就是去斯大林模式化，即革除前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历史告诉人们，正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中国才没有重蹈前苏东国家的覆辙。

当然，今天不能用现在中国的理论和做法，机械地评判前苏联模式的是非对错。

但有一点必须清楚：离开发展人民民主，离开不断改善民生，谈不上建设社会主义；离开平等、尊重人权、社会的公平正义，也谈不上建设社会主义。

中国仍然处于从前苏联模式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转变的过程中，其最后的结果如何，取决于抛弃前苏联模式的彻底程度，取决于是否真正实现了让人民当家作主，取决于中国社会是不是一个实现了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11-9 刘瑜：超越那些想当然



刘瑜，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

“摘下有色眼镜观察他国并不容易，因为我们脑子里充满了各种“想当然”。也许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我们怎么看待他国，而是怎么看待自己。”

2004 年，《外交季刊》登过一篇文章“一个正常的国家”，作者是学者 Andrei Shleifer 和 Daniel Triesman。他们针对当时西方媒体、学者和政治家将俄罗斯的情况描述得一团漆黑的情况，试图论证俄罗斯的情况虽然不那么好，但其实也不那么糟，是个“经济中等、政治凑合”的“正常国家”。之所以那么多人唱衰俄罗斯，大约一则是因为很多人还是把注意力停留在俄罗斯刚开始转型的那几年，二则因为苏联的历史地位，人们对俄罗斯的预期太高，不能以“平常心”来看待它。

不能以“平常心”来看待俄罗斯——乃至转型后的中东欧地区的，不仅仅是西方国家，很长时间以来，中国的媒体和学界谈到转型后的前苏东地区，也是条件反射般地将它与“乱”、“崩溃”、“衰退”、“动荡”、“教训”等词语联系在一起，以至于在很多中国人的脑海里，因为苏东的经历，“转型”成了“狼来了”里面的那个“狼”。

金雁的新书《从“东欧”到“新欧洲”》就是试图帮我们摘下有色眼镜，“用发展的眼光”，去观察和了解一个正常化的中东欧。换句话说，这是一本挑战迷思、破除成见的书。

成见之一就是转型之后，中东欧各国经济陷入崩溃边缘，民不聊生。由于经济体制的巨大变动和贸易体系的重组，很多中东欧国家在转型初期的确经历过经济萧条、通胀飙升的阶段，但是转型的阵痛在 90 年代中期之后逐步让位于正常的发展。事实上过去十多年，除了金融危机时期和个别国家，大多中东欧国家都经历了相对高速的增长。比如，就人均购买力 GDP 来说，世行数据显示，捷克 1990 年是 11209 美元，2010 年则达到 25232 美元;匈牙利则从 8778 美元上升到 19764 美元;波兰从 5473 升到 19059 美元;俄罗斯从 9119 升为 18963 美元;就连经历过战火的塞尔维亚，人均购买力 GDP 都从 1997 年的 6407 美元(最早可得的数据)上升为 11719 美元……也就是说，过去 20 年，大多中东欧国家人民的生活水

准基本实现了翻番。中国由于起点低，经济增长当然更快，但是即使如此，2010 年中国的人均购买力 GDP 仍然只有 6828 美元，远不足以骄傲地“一览众山小”。

更关键的是，中东欧的经济发展没有带来急剧的贫富分化。从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指数来看，中国近年的基尼指数达到 0.48 左右，但是相比之下，捷克的基尼指数是 0.26(2005 年)，匈牙利 0.25(2009 年)，波兰 0.35(2005 年)，罗马尼亚 0.32(2008 年)，塞尔维亚 0.26(2008 年)……可以说，除了俄罗斯这个“特例”(2009 年达 0.43)，中东欧地区尽管市场转型，依然属于地球上最平等的地区之一。

成见之二是，转型之后议会政治“吵吵嚷嚷”，政党频繁更迭，社会动荡不安。不错，走向议会政治之后，中东欧各国走向了多党政治。几乎所有中东欧国家都已经经历了几次不同政党之间的权力更迭。但多党政治是否就一定会导致过度的社会动员，造成社会动荡?未必。固然，有了议会政治，媒体上会多出议员们吵架甚至打架的不雅画面，但如果一个社会存在矛盾是必然的，那么把矛盾放到议会这个“容器”里让官员帮助百姓打“代理战争”，可能反而比让矛盾遍地开花要好。毕竟，议员们在议会里相互吹胡子瞪眼，总好过民众今天浇汽油自焚表达利益诉求、明天拿着刀去警察局砍人。事实上，根据“政治不稳定指数”2007 年的排名，大多数中东欧国家政治相当稳定:捷克的稳定性排在日本前面，波兰排在英国前面，白俄罗斯排在美国前面，匈牙利排在希腊前面。即使是乌克兰式的颜色革命曾经伴随着社会冲突的加剧，但冲突最后还是以一种“体制内”的方式和平解决——而和平地解决政治冲突，是民主相对稳固的一个显著标志。南斯拉夫式的内战流血固然触目惊心，但其中的矛盾源远流长，米舍洛维奇煽动塞尔维亚民族主义也早在转型之前，恐非一个民主转型可以全盘解释。

成见之三，则是我们多年来对“休克疗法”不由分说的批判，对“渐进改革”不由分说的拥抱。长期以来，一提到苏东改革，我们就想起休克疗法，而一提到休克疗法，我们就摇头叹息。金雁以富有洞察力的分析告诉我们:爱沙尼亚的改革很“休克”，但是它发展得很不错;白俄罗斯的改革很“渐进”，但是它发展得要慢的多;乌克兰从来没“休克”过，但是它的转型经济上几乎可以说是最失败;俄罗斯被视为“休克”的典型，但是它只适用过休克政策不到一年……现实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使得我们难以以“休克还是渐进”来鉴别改革的成败。在金雁的分析里，各个国家的历史遗产和改革原初状态，往往比分析其改革速度更有解释力。

事实上，金雁指出，在大多数中东欧国家，由于民主的政治框架，真正的休克疗法很难出台和推行。强大的工会力量和民主的讨价还价过程，使得多数中东欧国家改革进程“淅淅沥沥”。波兰的格但斯克造船厂私有化谈了五年，罗马尼亚的日乌河谷煤矿私有化谈了十二年，捷克的克劳斯据说是标准的新自由主义者，但其执政期间只能推行高税收高



福利、反兼并反破产的政策。所以 20 年改革下来，多数中东欧国家没有改成传统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倒是改成了“福利国家”。相比之下，中国某些地方一个市长或者厂长，一拍大腿就可以卖掉一个企业或产业的做法，反倒是显得更“休克”。

摘下有色眼镜观察他国并不容易，因为我们脑子里充满了各种“想当然”。也许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我们怎么看待他国，而是怎么看待自己。其实中东欧国家现在肯定还存在诸多问题:超前的福利政策可能导致寅吃卯粮的财政危机、经济对外的高度依赖性使得它在金融危机面前格外脆弱、某些国家极右翼政党的兴起令人担心种族主义的复苏、一些国家的选举争端让人忧虑民主是否在该地区已经稳固……但是，任何“正常”的国家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果因为中东欧国家的问题而忽略其进步与发展，甚至以之为借口对自己的改革固步自封，就既是对他国的不公平，也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了。也许从《从东欧到新欧洲》这本书开始，我们思考苏东转型时，思考的就不应当仅仅是其“教训”，而且也应该是其“经验”了。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11-10 姚望：20 年后，俄罗斯想起苏联的好



姚望，南方周末特约撰稿人。

“

（2011 年）12 月 25 日，是苏联解体 20 年，而在此前一天，反对派们将在莫斯科的萨哈洛夫大街举行联合示威，据说比 12 月 10 日还要大，而示威存在的本身，可能就是这个国家转型以来的最大后果。

”

1991 年 12 月 25 日 19 时 32 分，红旗在克里姆林宫降下，这是苏联的旗帜最后一次在这里飘扬。成千上万的人在红场，或者通过电视目睹了这一刻。

2011 年 12 月，随着俄罗斯杜马选举落幕，人群再一次在街头大规模聚集。他们要么高喊着“普京，走人!”要么喊着“普京，挺住!”最紧张的时候，大批军警让人依稀想起 20 年前。只不过，这一次他们不需要面对政变的国家干部，更不必用坦克炮轰议会大厦。

无论是反对者，还是支持者，谁都知道俄罗斯不会回头，他们只不过是希望生活得更好。

2011 年 12 月 18 日，俄罗斯莫斯科，数万民众举着普京和梅德韦杰夫讽刺像进行抗议游行。这是苏联解体以来规模最大、影响范围最广的反政府运动。80 岁的戈尔巴乔夫依然忙碌。除了因为 4 月的脊椎手术和术后必要的恢复时间，他的日程被各种社会活动挤满。11 月，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筹办了名为“苏联 1989-1991，着眼于未来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国际研讨会。但基金会的日程上至今没有给 2011 年 12 月 25 日留下项目。

这些天进入基金会的网页，会看到网页上用大号字写的，“1991 年 3 月 17 日，为了保留苏维埃联盟而举行的全苏联公民投票，76.4%的民众支持保留苏联。”苏联时代的最后一次全民公决成为这位苏联末代总统的心迹证明。

戈尔巴乔夫妻子赖莎已经听不到莫斯科街头的喧嚣。她于 1999 年去世，安葬在新圣女公墓。公墓紧挨新圣女修道院，与克里姆林宫遥遥相望。

同样听不到这喧嚣的还有叶利钦、盖达尔、切尔诺梅尔金。在今天的俄罗斯，不乏有人要他们为今天一切的“糟糕”负责。叶利钦，戈尔巴乔夫的老对手，俄罗斯第一任总



统，被认为摧毁了苏联。但奇怪的是，对他的评价常让俄罗斯的左派右派陷入价值混乱。盖达尔总理任内以推动休克疗法著称，他“卖掉了国企”。切尔诺梅尔金则是盖达尔继任者。如今，他们继续搭档葬在这个墓园。

叶利钦的墓距离赖莎的墓地三十米左右，一面俄罗斯国旗状的雕塑覆盖其上。盖达尔和切尔诺梅尔金的墓和叶利钦相距也不远。只不过，切尔诺梅尔金 2010 年刚过世，墓碑尚未安放，暂时是一个简易的木十字架。

曾被赋予转型重任的俄罗斯最高领导人，现在只剩下了叶利钦最后选定的普京。而且，他没法像自己的两位前任那样彻底撒手不管。

对于普京来说，苏联解体 20 周年的前夕，不仅仅有杜马选举后的大规模街头抗议、骚乱这样的坏消息，也有历经 18 年艰苦谈判，俄罗斯终于能够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成员这样的好消息。俄罗斯正越来越被世界接纳。

现在最重要的是明年 3 月 4 日举行的总统大选。12 月 17 日，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宣布将再接再厉。次日，造势大会在马涅什广场拉开，乌拉声中，红旗猎猎。

而更早的一周前，支持普京的集会也在马涅什广场举行，他们的口号是“普京，我信任你”。有趣的是，亲克里姆林宫组织的集会的主席台背靠克里姆林宫，而俄共的主席台则面向克里姆林宫。

不过，俄罗斯的民众顾不上研究这些形式，他们现在会不由自主想起 20 年前，他们最关心的是，这些人究竟能给大家的生活带来怎样的改变。

腐败

“统一俄罗斯是小偷和骗子。”在俄共的集会上，有人高呼着。这已是最近示威的流行语。统一俄罗斯和腐败之间被这口号划上了等号。

“腐败现在是这个国家最大的问题。”莫斯科大学教育系副主任马什金娜副教授这样说。列瓦达中心的一项民调显示，53%的俄罗斯人承认，曾通过贿赂解决问题。

不过，这并未给执政党带来困扰，反腐在执政党那里同样响亮。5 月，“统一俄罗斯”的一个青年组织在莫斯科举办反腐集会，几位模特穿着超大号的老鼠装，晃着大肚子一摇一摆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组织者们还给参与集会的青年们发放白色的围裙，象征要把国家打扫干净。

腐败总是和转型如影随形。如果转型中，权力的监督体系不健全，而官僚主义又没能清除干净，那么腐败的滋生就成为必然。近十多年来，反腐几乎已经成为俄罗斯各党派的众口一词，可见腐败的严重。



高调反腐始自叶利钦。他在 1997 年 4 月宣布，他第二个任期的主要任务就是反腐败，并宣布所有的官员在一个月内都必须向税务局申报自己的财产状况。而到了普京当总统时，国家再也不容许腐败分子逍遥法外了。

但这个任务，普京还没完成。2007 年在回答《时代》周刊的提问时，他坦陈:“这个问题我们解决的不成功，也未能控制住局势。”梅德韦杰夫当总统时，他更进一步，推动反腐败法，让官员公布财产等，有一批官员因此丢了乌纱帽。

但是俄罗斯人不满意。

政治学家阿列克谢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公布财产。只是公布可见的一部分……你去任何一个城市看看，再小的城市，城市周边好地段的漂亮别墅，都是官员住的。就他们那点工资，怎么买的起这么贵的房子?”反对派领导人涅姆佐夫引用“清廉国际”指数——2000 年俄罗斯的排行是 82 位，而到了 2009 年是 146 位，向记者直斥，普京任内，腐败恶化。

杜马选举已经清晰地释放出了人民的不满。虽然统一俄罗斯党利用执政所掌握的资源补仓，但是统一俄罗斯获得选票的下滑超过十个百分点。

但阿列克谢的朋友仍然投了统一俄罗斯一票，“虽然他认为统一俄罗斯，正如反对派所宣传的那样，是小偷和骗子的政党。但是其他党派以及他们的领导人也好不了多少。他们上台都一样。与其养肥了一拨，之后再养肥另一拨，还不如继续养原来的那一拨。”

保障人的安全感

俄共的集会，老年人总是特别多。除了情感因素，苏联曾经给予他们生活的安全感，恐怕这最重要的因素，正是当前俄罗斯所给不了的。

“我们需要更多的安全感。这也是这个社会的任务之一。更好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政府的官员们更好地为社会服务。”马什金娜副教授说。

“比如完全的免费医疗，良好的服务。”政治学者阿列克谢视其味当然。因为在苏联，这些都是免费的。

今天的俄罗斯其实保留了医疗免费的渠道，尤其是在急救领域，比如如果因为急病打了急救电话，从救护车上门，到随车医生初步诊断，到最后医院治疗都是免费的，甚至还包括免费的三餐。虽然这三餐的口味未必好。

但一位医生向南方周末记者指出症结，理论上的免费，其实是国家和公司共同购买保险负担的。有钱的公司购买的保险比较多，所以对应的医疗服务也比较好。免费的治疗有时候需要用到新引进的药，或者是新的机械设备，医院没有，总会让病患自己购买。

提起医疗，伊万诺夫就牢骚满腹。“国家对这个领域投入的财政越来越少。服务质量也比较差。还要自己买药，需要一些治疗的时候还要排队……”伊万诺夫很怀念苏联时期的疗养体系，那时候，每隔一段时间，工人都有机会度假或免费疗养。

除了医疗保障外，退休保障也是一个问题。退休金多少暂不说，眼见得政府部门的退休金总是以看得见的速度增长，就足够让人生气了。

马什金娜副教授认为，在苏联时代，退休者们知道退休金是足够养活自己的。

正是这些基本的医疗以及退休保障，构成了人们对于自己未来的预期。这是怀念苏联的最基本动机。

“或许富裕了，但是社会没发展。”

告别革命

选举前，所有的集会都在努力和“颜色革命”划清界线。久加诺夫在讲话中“着重强调，这不是黄色革命”。(黄色革命特指 2004 年发生在乌克兰的抗议事件。)“我们不是阿拉伯，我们不需要武力，我们不会打仗。”这是 12 月 10 日，波罗特诺沃广场反政府示威中，一位组织者在台上呼吁。当外界纷纷以阿拉伯之春指代这是俄罗斯之冬的时候，12 月 10 日大示威的组织者，就这样和阿拉伯的事情划清界限。

而一些支持普京的青年团员表示，如果革命发生，他们会上街保护政府。“我们并不希望这里发生革命。”“我们不需要革命。”马什金娜副教授说，“革命会破坏很多。我们希望生活的好，我们不希望战争。”二十年前，那个历史关键时刻，两度让俄罗斯滑进了战争的边缘，让俄罗斯人深深庆幸。

一次是“八一九”事件，保守派发动的紧急状态委员会动员军队，进驻莫斯科。叶利钦以俄罗斯总统名义接管军队，避免了军队分裂。

另一次是，1993 年 10 月，俄罗斯苏维埃和叶利钦为代表的总统力量火并。但幸好总统掌握着军队。武力的不对称，使战斗迅速结束。如今在总理府白宫的背后，还有那次事件死亡者的纪念碑。

还是普京?

“普京、梅德韦杰夫，普京、梅德韦杰夫，普京、梅德韦杰夫。越来越老、越来越老……”2011 年 12 月 18 日，红场边共产党举行的集会上，一幅图画试图向路人说明，为人所诟病的连任可能恢复苏联历史上的老人政治。



二十多年前，苏联总统制度确立的时候，总统任期四年，只可以连选连任一次，但是普京用出人意料的曲线连任规避了这一规则。

但不管反对派如何不喜欢普京，所有人都知道没可能发生革命。这一方面是因为，42%的支持率虽然是普京个人的最低点，但仍然领先其他政治精英。必须承认，在总理任上的四年中，普京没有取得重大的成就，淡化了人民对普京的印象。作为总理，他一方面要表现出对总统的尊重，另一方面还得继续尝试，实践自己的承诺，给大家一位有个性的总统候选人。梅德韦杰夫作为总统的名声在解除莫斯科市长卢日科夫的职位和视察南千岛群岛期间达到了顶点，而普京本人则顶多是秀一秀肌肉。在缺少对民众不断的新刺激的情况下，普京声望的下降在所难免。

但即使这样，大多数的观察家，还是预计普京在 2012 年 3 月会赢得总统的选举。问题只是在于第一轮当选还是第二轮当选。

马什金娜认为，很多领导人可以提出很多漂亮的口号，但不能以自己的行为做榜样。目前大多数政治人物没有关心社会的理想。

对于未来，有人灰心。“俄罗斯行政体系改革那么多次了，每一轮改革，都要减少公务员，但是越减越多。比苏联时期比率高多了”。所以这次杜马投票率创了新低，没投票的人会告诉你，自己影响不了国家，什么也改变不了。

也有学者对未来有所期许，俄罗斯社会科学院院士潘科娃教授对我说，她支持修宪延长总统任期，因为完成国家一些战略任务需要更长的时间。

这到底是怎样的道路?普京十年前说：“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社会昌盛、人民自由，用意识形态的方式搞经济，导致我国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无论承认这一点多痛苦，但我们将近 70 年都在一条死胡同里发展，这条道路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他的一段话为人所熟知:“给我二十年，我给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现在他正在一点点地使用这二十年，但留给他的时间够吗?

12 月 25 日，是苏联解体 20 年，而在此前一天，反对派们将在莫斯科的萨哈洛夫大街举行联合示威，据说比 12 月 10 日还要大，而示威存在的本身，可能就是这个国家转型以来的最大后果。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11-11 余亮：这可真是决战的最高指示

余亮，从事文化研究。

> **固然很多读书人仍纠缠于苏联道路与美国道路，而且这样的争论也确有必要，但大多数时候已经变成无趣的精神恐吓，令自己生活在自己制造的紧张感里乐此不彼。**

在今天的中国电影市场，为了能收获如潮的差评，《小时代》、《富春山居图》等制作方都不惜动用巨额投资和豪华明星阵容。反观一部由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生制作的动画短片，仅用八分钟时间和网络自发传播就收获了铺天盖地的评论。豆瓣网上目前已经有 1 万多人评分（电影《小时代》目前收获 6 万份评分），其中差评和好评几乎一样多。

没错，我说的是《前进，达瓦里希》。这部 90 后制作的毕业设计作品，于无声处升腾而起，震动了各个年龄段的人们。正如之前有人评价的那样，从来没有一部作品引发观众如此态度鲜明的对立。甚至只要看到片名，你大概就已经感受到自己的态度了。因为涉及苏联题材，观众评分变成了一星和五星的对决。争议的双方，尤其是那些给出一星评价的读者们，就仿佛收到了“决战的最高指示”一样，进入不依不饶的搏斗状态，甚至把所有支持该片的网友名单一个个列出来“示众”。

我觉得导演可以在电脑后面狡黠地微笑了。这真是决战的最高指示，能让无数宅男宅女身不由己。

“决战的最高指示”，这大概是片中最催泪的一句话，一直珍藏于主角小女孩的心中。短片开始，这个貌似生活在北方的小女孩，在老旧平房里用积木建设未来的家园（看看，是不是和你小时候玩得那套一样？）。“妈妈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理解支持我们的建设，但并不能否认它的伟大。”积木高楼里依次住着猫咪扮演的弗拉基“咪”尔同志、小鸡扮演的菲利克斯•捷尔任斯“鸡”同志、小鸭扮演的贝利“鸭”同志。

“贝利亚同志”，一星观众们火了：你们称这个恶魔为同志？你们懂历史吗？另一边的观众大约会和影片强大的志愿顾问团队一样微微一笑。这当然不是事件历史，除非你认为积木房子是真的房子。这是普通人的情感历史，是那些来不及告白就被风云诡谲的 90 年代埋葬的情感的重返。



房子拆了，积木扔了，电视里那个脑门上有地图胎记的人正在宣布苏联解体，妈妈却忙着推销美式化妆品。列宁同志、菲利克斯同志病死了，贝利亚同志被卖进小饭店熬汤了。全家搬进了曾经梦寐以求的高楼，却是以抹去过去的一切信念为代价。小女孩在电梯里黯然问妈妈："我们的大楼会不会被美国炸掉？"砰，脑袋上挨了重重一记。

这真是经典的梦魇。看似无厘头，却一下戳中了多少人。99 年曾经发生过的惊梦就这样被作品消化了。这一定是那些剧本顾问们，那些活跃于各个军坛、爱国论坛的精灵鬼宅们的鬼点子。记忆不受时间束缚，自顾自挤到一起，反而更具有历史穿透力。

反对者们急着控诉苏联的"黑暗"史，为编剧和支持者的"无知"捶胸顿足。支持者们也没有轻松到哪里去，同样使劲寻找影片与现实的一一对应。积木被妈妈扔了，只有贝利鸭"盗窃"的那几块幸存下来。观众问："贝利亚保存的社会主义大厦屋顶说明了什么？"小女孩说："妈妈背叛了我们。"观众问：妈妈又是谁？

当电视里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的时候，小女孩冲出家门，穿过黑夜的城市奔向昔日的家园，这幕景象令人动容。接近施工重地时，大爆炸发生了。星火如雨，小女孩终于来到人民英雄的世界。昔日玩伴们身披戎装冲向前方，同志们在坦克前面依次立正敬礼。菲利克斯再次将小蜡丸交给她，里面保藏着决战的最高指示——"前进，达瓦里西！"

部分观众纠结，小女孩死了吗？一种解释认为，这是一起工地施工事故，小女孩在死亡后穿越回了卫国战争时代。但穿越还真需要死亡么？在我看来，工地废墟就是那不可触摸的精神坟墓，埋葬着记忆与理想。工地后边就是遥不可及的地平线，来自那里的召唤千言万语也无法诉说清楚，只能用一场大爆炸来启示。大爆炸也是小女孩世界坍塌的一个迟到的回响——世界已经改变，该如何面对昔日的信仰和全新的世界？

从小女孩冲出大厦开始，不再有旁白和对话，只有悲锵有力的音乐。最终的镜头既是结束也是开始——女孩怀抱步枪守卫在积木的废墟之上，守护在昔日的精神遗产上。这是否触摸到你心中关于《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记忆？网友甚至为片尾的一张张插画找到了现实中对应的苏联照片。无论如何，短短八分钟把一个昔日的国家及其所创造的崇高幻想重新推到了人们面前。作为艺术作品，成功地触动我们各方面的情感记忆。有人慌忙说要理性看待这部作品。可是谁在乎理性不理性呢？无论怀念还是谩骂都是烟火。用理性来遮掩自己苍白的情感，或者掩饰自己那颗颤栗的心是没有用的，就像《阿凡达》里的飞龙面对真命骑手拼命而徒劳地抗拒心跳。情感并非虚无，而是支撑这个世界的终极基础。在情感面前，书呆子们的理性因为发现自己的虚无而惊恐。

有人热泪盈眶有人跳脚骂街，不知道为什么，我想起了二十多年前看到的一副漫画：巨人列宁笑眯眯地俯下身子，会议桌上的小人物们便惊慌失措四散而逃。



说这部作品想要反攻倒算的人当然是神经过敏，不过每个人确实看到了自己想看到的东西。支持者也许看到这背后中国人的筚路蓝缕，今天的中国已经恢复力量可以重新“怀旧”，而且是怀理想主义的旧了。

一位评论者说得对：影片中明确标示出来的意识形态恰恰不是真实运行的意识形态，谁盯着苏联符号去赞美或者诅咒都是不自觉掉到沟里。他们面对的是自己的心魔。交上这份毕业设计作品的年轻人王一琳，她在回应观众批评时候远比争论双方想象的更通达更轻松。她可能无意于把 90 年代政治经济分析得清清楚楚，她只需要造出这个迟到的梦境，让无处告白的情感获得净化，她只需要造出这面历史情感的镜子，让每个人都不经意间在它面前现形。

面对歇斯底里的争论者，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应该放轻松，因为这些仅仅是符号。说是符号，虽然也对，但似乎没有说完。拿符号怀旧是文艺界常见的伎俩，云南原始风情的符号，西藏雪域高原的符号，阿凡达异域神话的符号……都不过是从历史情境里抽离出来的表演物，体现着现代人的精神欲望而不是过去。然而这部作品里的符号并非仅仅作为表演者出现，实在是象征了新的情感形式。

那些甚至能从《黑猫警长》里解读出纳粹思想的青年固然无趣，但一切仅仅是宅男宅女们的精神内战么？这些终将失去青春并掌握未来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类？

无数人质疑，没有经历过那段时期的 90 后怎么会拍出这样的作品来？有人说片尾感谢姥姥和姥爷的字幕给出了解释。但依然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 90 后需要这个？这绝不只是在为上一辈人捡起碎梦，这正是 90 后自己的梦！

按照符号说，那么他们也可以借用欧美符号或者电影记忆来做同样的事情。但在我看，恰恰是越来越多的人厌倦了美式符号。美国梦已经千疮百孔，欧洲梦也萎靡不举。90 后的中国梦如果要回溯过去，更愿意向一个被毁的伟大梦想致敬。这正是符号-情感领域的博弈。或许他们讨厌的是这些符号在中国的使用方式。怪不得美国，也许要怪公知和消费社会对美国符号的透支。斯诺登事件就很清楚，一切来自美国的崇高话语都失效了，美国（政府）粉们无法面对斯诺登。他们说斯诺登不是英雄是叛徒。我认为这话非常真实，因为正好说明美国文化已经不能产生英雄。有志青年们也已经厌倦了普世大片的情感表达方式。

对，这是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我们也要警惕英雄主义的欺骗。但人作为启蒙所许诺的高贵生物，是无法整天承受“小时代”之猥琐庸俗的。人必须要有精神，要有对英雄气概的体验。这是再多的腹诽，再多的“新启蒙”也阻挡不了的。当那声启示的爆炸声传来，为之兴奋的人们将毫不在乎暴露心中所有会让雅致的阿伦特主义者们颤栗的崇高光线！



如今依然占据主流舆论的人们不肯面对的一个事实是，新生长起来的青年已经没有了前人念念不忘的历史负担。固然很多读书人仍纠缠于苏联道路与美国道路，而且这样的争论也确有必要，但大多数时候已经变成无趣的精神恐吓，令自己生活在自己制造的紧张感里乐此不彼。

拉开距离，并且站在今天的中国来看，新青年们认为被毁灭的梦想依然是梦想，而那些至今仍然守着苏联坟墓，随时神经过敏准备镇压幽灵的公知以及少年公知们，其实也就是幽灵的伴侣，他们已经死去，却自以为还活着（人鬼情未了？灵异第六感？）

通过一部短片固然无法判断全部情况，但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新的崇高感正在新青年当中升起。影片中的人民战争不过是崇高的终极隐喻。那些出生在消费时代文化中的青年们，他们的理想主义、爱国主义一定更让“启蒙公知”们感到痛苦和无法理解。但我们也不能断言，这究竟是绝地反击，还是回光返照，毕竟精神结构需要实践形式的支撑。无论如何，“决战的最高指示”，和无数曾经激励过一代人的启示言语，将始终是一个幽灵。当你认为已经忘却他的时候，他就微笑。当你凌辱作践它的时候，你就会收到那一声爆炸的久远回响。

（本文来源于观察者网）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主编：方可成

编辑：姚梧雨童

设计：潘雯怡，季文仪

校订：刘岩川

出品人：杜婷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doc 版请发空邮件至 cochinaweeklydoc+subscribe@googlegroups。com；若订阅 pdf 版请发送至 cochinaweeklypdf+subscribe@googlegroups。com；mobi 版至 cochinaweeklymob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epub 版至 cochinaweeklyepub+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此电子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是在香港注册的非牟利团体，论坛理事杜婷、梁文道、闾丘露薇、周保松。除了一五一十周刊之外，Co-China 每月还在香港举办论坛，并透过网络进行视频、音频和文字直播。2012 年开始 Co-China 在香港举办面向青年的夏令营，第一届主题为「知识青年，公共参与」，2013 年夏令营的主题是「始于本土：本土、国家、世界冲撞与协商」。

Co-China 论坛网址：https://cochina.co

Co-China 论坛新浪微博：CoChina 論壇（http://weibo。com/1510weekly）

Co-China 论坛 facebook：「我在中國」（Co-China）論壇（https://www。facebook。com/CoChinaOnline）

